

尼 采

万 志 勇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尼 采

万志勇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幼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在普夫达求学.....	(7)
第三章	发现了叔本华	(13)
第四章	从军生涯	(18)
第五章	年轻的语言学教授	(25)
第六章	与瓦格纳相识	(30)
第七章	第一部哲学著作的诞生	(36)
第八章	与瓦格纳的决裂	(45)
第九章	女人与鞭子	(51)
第十章	最黯淡的日子	(58)
第十一章	在曙光中寻觅欢悦	(64)
第十二章	独一无二的杰作	(78)
第十三章	最后的光芒	(95)
第十四章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108)

第一章 幼少年时代

1844 年 10 月 25 日凌晨，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州的洛肯镇，一个小男孩呱呱堕地了，这个小男孩是卡尔夫妇婚后的第一个儿子。看到他可爱的脸蛋和圆滚滚的四肢，夫妇俩心中充满了喜悦。

卡尔是路德派虔诚的教徒，就在离家不远的教区当牧师，在当牧师之前，他曾经在阿腾堡住过几年，在那里他是一个家庭教师，负责四位公主的教育。这四位公主是赫赫有名的汉诺威皇后、康士坦丁女大公爵、奥登堡女大公爵和泰莱莎公主。他尽心尽现地教育她们，她们对他也深怀敬意。

卡尔的祖先是波兰贵族，但他本人却受到德国文化的熏陶，他不仅兢兢业业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也非常忠诚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并得到了国王的信任。他被指派到萨克森州的洛肯镇去做一名乡村牧师，在就职前，他从国王那里得到了一笔钱，作为在洛肯镇时的生活费用。这笔钱数目还算比较大，所以他搬到洛肯后，经济上从未出现过困难。卡尔的妻子名叫法兰斯卡，是一位典型的德国人。她性格温柔、和善、慈祥，而且非常能干。也许是上天的特意安排，卡尔夫妇儿子出生的日子正好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日。他们为儿子出生在举国为国王欢腾喜庆的日子感到吃惊和兴奋，于是他们就给孩子冠上了霍

吞索伦王朝弗里德里希·威廉这个名字，这个孩子就是我们书中的主人公，日后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尼采的父亲是一个温和宽厚的人，他对尼采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希望和爱。父亲非常热爱音乐，常常即兴弹奏钢琴，使年幼的尼采受到极大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尼采也开始爱好起音乐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兴趣不断浓厚了。

不幸的是，尼采接受父亲的爱总共还不满五年，由于文弱、多病，他父亲在 1849 年 7 月死于脑软化症，当时年仅 33 岁。几个月后，尼采刚满两岁的弟弟约瑟夫又夭折了。亲人接连不断的去世，使尼采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摧残，他犹如一棵刚刚吐芽的小苗，还没有充分地得到阳光和雨露的滋润，就感受到了人世的凄惨和无奈。从此他幼年的平静生活被打乱了，他本来就脆弱的心变得更加敏感、忧伤，这也铸成了他日后抑郁寡欢的性格。后来他曾自己回忆道：“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见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这往往是在大自然的自由殿堂里，我在那里找到了最真实的快乐。一场雷雨时常会给我留下最美好的印象，满天轰鸣的雷声和闪亮的电光更增添了我对上帝的敬畏。”

父亲死后的第二年，在祖母奥德姆丝的帮助和支持下，尼采随同母亲和妹妹迁居到瑙姆堡，去和祖母和两位姑母住在一起。要离开自己生活了 6 年的洛肯镇，尼采心中充满了惆怅和恋恋不舍。在他 14 岁时写的自传里，他这样描绘迁居时

的心情：“忧郁的晚涛钟声传到前厅，夜色笼罩大地，天空一轮明月，繁星闪烁，我久久不能入睡，夜半时分，悄悄走到院子里，这里停着许多满载的大车，车夫们朦胧的脸庞在小屋里隐约闪现，我简直不相信要去另一个地方安家。这里，我曾品尝过欢乐和痛苦；这里，安葬着父亲和小弟；这里，居民们始终和睦亲切相处，离开这个村庄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啊！天朦朦亮，大车穿过乡间大道，把我们运往瑙姆堡，我们将在那里安家，别了！别了！亲爱的父宅！”

在瑙姆堡，尼采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读完了小学和文科中学（相当于初级中学）。在读小学的时候，尼采可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举止文雅端正，从不做冒失无礼的举动。有一次放学后，尼采正在回家的路上走着，天空中突然阴云密布，接着便下起瓢泼大雨，小伙伴们都发疯似地朝家里狂奔，但是尼采却仍然不紧不慢地走着，他用帽子遮盖着写字用的书写板，又把自己心爱的小手绢盖在上面，生怕雨水淋湿了写字板……回到家里，他妈妈问他为什么不赶快跑回家，被雨水淋得浑身湿透的尼采一本正经地说：“妈妈，学校的校规说，在离开学校时，孩子们不得在街上乱奔乱窜，他们必须安静地、举止文雅地走回家中。”小尼采的这番话弄得妈妈哭笑不得。

少年时，尼采的身体很孱弱，经常生病，眼睛又近视，更可怕的是，他小小年纪，却经常莫名其妙地头痛，母亲常用冷敷和淋浴的方法给他治疗，让他少一些痛苦。有时，母亲带着小尼采到野外去散步，让他在大自然的清新环境中忘掉头痛。

在学校里，他性情孤僻，很少与人交往。除了偶尔和性格开朗的妹妹伊莉莎白做游戏、溜冰、游泳外，他几乎没有和别的小伙伴尽情地玩耍过几次。在他以后出版的自传《瞧！这个人》中，他曾对自己的孤僻进行了解释，他说自己有“一种完全不可思议的清洁本能”，这种本能使他“一眼就可以看出那些隐秘在许多人性深处看不见的污秽”，正因为这种清洁感使他难以容忍一般人，这给他与人的交往带来了许多障碍。平常的时候，他总是躲开同学们，抱着一本厚厚的《圣经》独自阅读，并且冥思苦想，其神情活像教堂里的耶稣，因此同学们在背后都称他为“小牧师”。

虽然尼采的性格不合群，但是他的头脑相当聪颖，学习成绩很好，做事也很有主见，除此之外，他对诗歌和音乐也情有独钟，并表现出了令人称羡的天赋和才华。他在10岁时，便爆发出了创作诗歌的强烈愿望。在这一年里，他一共写了50首诗，还作了一曲圣歌。他自己在后来曾回忆说，14岁那年，他已经有过三次写诗的高峰期，这些诗歌总体上都带有一种浓厚的忧郁成分，这其中有不少诗是对故乡和父亲的追念、对孤独的歌颂。由于尼采从小已习惯了乡村的宁静生活，所以他并不适应小城瑙姆堡的窄小街道和嘈杂的人群，他总是思念着童年时的阳光、鱼塘和草坪，希望回到美好的大自然之中去。他在一首《回乡》诗中这样写道：“我凭吊父亲的坟墓，/哭了许久的时光。/许多凄苦的眼泪，/流下来滴在冢上。/在我尊重的老家，/我觉得寂寞而伤恸，/因此我常常出去走往阴暗的林中。”在读中学时，尼采还构思过一部题为《死亡与毁灭》的中篇小说，这说明死亡和悲观主义在

他幼小的生命中早已播下了种子，从那时候起，他敏感的心灵就对生存和生活的意义有了朦胧的忧思。

此外，少年时代的尼采对音乐一直非常热爱，这种热爱一直伴随到他去世。尼采对音乐的热爱主要是早年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他在瑙姆堡上小学时，母亲还带他去结识了一些当地的音乐家，他们的学识和才华使小尼采开阔了眼界，加深了他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在他 11 岁时，母亲专门为他买了一架钢琴，并请了当地最好的女钢琴家亲自来教尼采演奏。所有这些，都为尼采打下了扎实的音乐功底，音乐后来成了尼采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之一。

尼采喜欢的音乐家主要有：莫扎特、海顿、舒伯特、门德尔松、肖邦、贝多芬、巴赫、亨德尔和比才，其中他最崇拜也最迷恋的音乐家是瓦格纳，他把瓦格纳视为心灵的知音，虽然他最后与瓦格纳的关系因思想观念的分歧而导致决裂，但是瓦格纳的音乐确实使尼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找到了精神的寄托点，并对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使他有信心和勇气向孤寂的生活大胆挑战，奋力拼搏。

尼采还谱写过不少曲谱，并对自己的音乐作品倍加欣赏，在他精神失常前夕，他还自称自己是一个老音乐家，并希望他谱写的一首管弦乐合唱曲《赞美生活》能够传世，以此作为人们对他的永久纪念。

除了对诗歌和音乐特别喜欢外，少年时的尼采还很喜欢画画，他喜欢别出心裁地用各种颜色构成多种图案，然后对着这些图画自我欣赏，似乎他画画不是为了表现什么，而只是一种寄托或发泄，后来当他进入普夫达学校后，由于功课

太繁杂，他对绘画的兴趣才慢慢淡化了。

总之，少年时代的尼采是一位沉静而多才的孩子，他幼年的性格和爱好对他以后的哲学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他青少年时代的朋友威廉·宾德给了我们最好的说明。威廉·宾德在他的自传中是这样总结少年尼采的：“他基本的特点是忧郁。从童年时起他就喜欢独处和深思，他心地善良而深沉。虽然还是个孩子，他当时就已经在思考许多大多数与他同龄的孩子们从不去注意的问题了。他从不做任何未经思考过的事情，而且不论他做什么事情都有明确的目标和充分的理由。此外，谦虚和知恩也是他的两个主要特点。”

第二章 在普夫达求学

1858 年，尼采以优异的成绩从瑙姆堡学校毕业了，同年 10 月进入了普夫达文科预备学校，这所学校离瑙姆堡不远，只有四英里，但是尼采必须住在学校里，因为这所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寄宿。普夫达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它以古典主义教育和严格的管理而闻名。这里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文教师，学生也多是一些特权阶级的子弟。这所学校曾培养了不少有名的人物，比如诗人和戏剧作家诺瓦尼斯、哲学家和爱国者费希特、语言学家和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施莱格尔等人，他们早年都在这里接受过教育。

在这所管理森严的学校里，尼采每周必须学习 6 个小时的希腊文，还要学习拉丁文 11 个小时，后来才改为每周学习拉丁文 10 个小时。在所有的语言中，拉丁文和希腊文是比较难学的，普通的孩子都觉得这两门课枯燥乏味，提不起兴趣，但是尼采却不一样，他不仅不讨厌这两门课，而且学得津津有味。在所有的课程中，他最喜欢希腊课，他常一个人在别人都已入睡的时候，安静地阅读古希腊文献，有时因入迷和过分投入书本，竟然一直读到第二天拂晓时分。古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阿那克里翁等人的思想和作品，如一阵春风吹进他的心田，给他带来了一种全新而欢愉的感觉，他像久旱的禾苗，拼命地吸收这些文化前辈们留下

来的精神养料，也就是从这时起，他的心中埋下了崇尚希腊精神，反对基督文化的种子。

在这个时期，由于他对希腊神话的过份热爱和崇拜，他曾计划与同学宾德共写一部关于普罗米修斯的戏剧，并着手收集了希腊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大量材料，他雄心勃勃地说：“我们要尽量写得绚丽多彩、栩栩如生、动人心弦，总之，要写得惊人。”此外，他还对古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的诗歌十分喜爱，因为这个原因，他与同样喜欢阿那克里翁诗歌的同学保罗·杜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与保罗·杜森一同交流心得体会，有时两人还一同朗读阿那克里翁的诗歌，共同的爱好使他俩互帮互学，彼此在学业上都获得了长进。后来，保罗·杜森成了基尔大学的哲学教授，同时也是著名的印度哲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在尼采死后的第一个周年，保罗·杜森写了一本《回忆尼采》的著作，这本书满怀深情地追忆了他自己与尼采在普夫达求学时期的学习情况和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

除了对希腊和拉丁文化感兴趣外，尼采还认识到研究德意志的古典作品、学习历史和地理以及外国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普夫达学校，他认真研究了德国的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同时也认真阅读了席勒、歌德、贺德林、拜伦、莎士比亚和卢梭的作品。在这些人当中，他对贺德林、莎士比亚和卢梭最为崇拜。

这个时期，尼采的读书量极大，他的文学概念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不像普通的德国人那样，对歌德总是持有浓厚的兴趣，他的兴趣转向了浪漫派的代表诗人贺德林。在他

17 岁时写的一封信里，尼采表现了对贺德林诗作的深刻独到的理解。贺德林诗中所表达的深沉忧郁和对故乡的思念，激起了尼采对少年时代的无限追忆，贺德林对德国文化某些痼疾的批判，正是尼采在思索中想要表达而难以说清的思想。贺德林对德国文化的精辟见解在尼采的眼前点亮了一盏明灯，这盏明灯为以后尼采深刻地反省德国的社会文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叫人感到遗憾的是，尼采以后也像贺德林一样发了疯，这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他们共同的性格倾向所至。

除了贺德林以外，尼采这时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莎士比亚也十分欣赏。1867 年冬天，尼采曾反复建议他的妹妹伊莉莎白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他告诉妹妹说：“莎士比亚向你展现了如此众多的强者，他们粗犷、刚强有力，而且意志坚定。我们的时代正是缺少这样的人。”此外，他对卢梭也非常欣赏，当他读卢梭的《爱弥儿》后，心中一度曾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卢梭的才华和见识让尼采钦佩不已，他激动地说：“从卢梭那里你可以俯拾自然流畅的文字，也可以学到你一定要信奉不渝的学说。”

在普夫达，尼采写诗的爱好的继续保持着，不过他对写诗和自己的诗有了新的看法，他认为自己 9 岁以前的诗只是描写奇怪的海上风光、风景和烈火，而且冗长啰嗦，没有半点艺术技巧。而 9 岁以后的诗就能用委婉动人的笔调和华丽鲜明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了。他决心继续进行诗歌创作，并打算用更多的功夫去钻研诗歌，甚至准备每晚写上一首。但是由于功课太紧，尼采写诗的计划只好搁置起来，这个时期他的诗作还不成熟，情感飘忽性很大，尽管如此，他还是写

出了不少优秀的诗篇，比如一诗名为《年轻的渔家女》，就写得哀婉细腻，韵味深长。诗中曾这样写道：“我遥望而悲泣，/看不见片帆回航。/又忧戚，又孤零，/悲恸扯断了肝肠。/迷雾飘散，/太阳在那边升上——/只有他才会知道，我为何这样忧伤。”

除了写诗外，他对音乐的热情也丝毫未减。他到普夫达学校不久，就成了学校合唱团的一员。另外，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宾德、克鲁特等人共同组织了一个文学和音乐的小团体——“德音志”社团，他们每人每月提交一篇文学或音乐作品，彼此交流和批评。同时他们还自筹经费，订阅了《音乐报》等刊物。尼采经常与朋友戈斯多夫到学校的琴房里去，在那里他会即兴弹奏钢琴，而且发挥得极佳。戈斯多夫曾对此作过高度的评价：“我不认为贝多芬会比尼采在即兴演奏时更动人，尤其是在天空出现雷鸣的时候。”在此期间，尼采的音乐兴趣开始发生变化，从古典音乐转向了现代音乐，他认为现代音乐也是有着很多魅力和潜质的。一段时间内，他甚至开始考虑把音乐作为自己将来的职业，并非常严肃认真地创作了一首名叫《受苦得自然之旨》的乐曲，而且还参加了学校一个名叫《十八岁的上校》剧本的演出。

由于对文学和音乐的爱好，尼采的思想变得越来越浪漫而富有想象力，也越来越大胆，他开始对基督教的严规戒律感到了厌倦。1862年4月，尼采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短论《命运和历史》(Fate and History)。在这本书中，尼采对上帝的存在、灵魂不朽、《圣经》的权威、神灵的教义等内容都表达了初步的怀疑，他说：“我们现在甚至都不知道人类自身是

否仅仅是整个宇宙、整个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时期，也不知道人类是不是上帝的主观表现形式……人类自身是一种手段呢？还是一个结局？”从此，他对上帝这个偶像越来越不相信了，他对神的思考也越来越多了，他开始以为神只是人类虚设的一个瓷器，人可以塑造它，也可以打碎它。伴随着对上帝的怀疑，尼采的哲学思想也开始慢慢萌生着，他开始相信自由对人类自身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他在给朋友宾德的文章中说：“绝对的意志自由和独立的命运会使一个人臻于完美的境地，而宿命的原则却使人成为丧失自我的机械人。”与此同时，他对以前的哲学也渐渐地表示了大胆的不满，他说：“在我看来，所有以前的哲学都像古代巴比伦人建造的通天塔，所有的努力目标总是想直接升入天堂或在地上建造天堂。”在进行着这些哲学问题的思考的时候，尼采对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幸福也有了自己的心得体会。1863年，他在给姑妈的一封信中说：“慰藉你心灵，美化你生活的是你内心的祝福而不是外在的恩惠，那些物质小利都是微不足道瞬息就会失去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尼采打算不去过一般世俗人所过的平庸生活，他要追求一种精神始终充满欢乐的理想生活。

在普夫达学校毕业之前，尼采结识了美丽多情的少女安娜·莱德尔，他们在一起非常幸福地相处过一段时间。但是由于年龄太小，他们又都各自忙着自己的学业，他俩终于分手了。尼采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

尼采在普夫达写的最后一篇论文是用拉丁文写的，内容是关于6世纪希腊诗人西奥格尼斯的论文。在文章中他把热

心拥护着贵族制的西奥格尼斯与普鲁士容克贵族们作了比较，并对普鲁士容克贵族的保守和狂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在即将从普夫达学校毕业时，尼采确立了自己未来的事业方向。他在后来的自传简历中写道：“为了未来的求学，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原则，抑制自己兴趣广泛却一知半解的倾向，培养自己对某一专业的兴趣并且探索它的最深奥的秘密。”这样他就决定放弃从事他所热爱的艺术的想法，而立志去钻研语言学。

他打算从语言学入手，致力于古典问题的研究。而在这之前，他已对古典问题进行了大量的钻研。在对古典问题的探索中，他发现德国戏剧起源于史诗，而希腊戏剧则发源于抒情诗并且含有音乐的因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种认识在他后来的第一部史著《悲剧的诞生》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发展。

1864年9月底，尼采从普夫达学校毕业了，结业时，他的宗教、德文和拉丁文课程都获得了“优”；希腊文课程获“良”；法文、历史、地理和自然等课程获中等成绩，唯有数学不及格。

从普夫达学校领到毕业证后，尼采与朋友保罗·杜森在家乡瑙姆堡痛痛快快地玩了半个月，然后又到莱茵地区去度假。在度假期间，尼采与保罗的家人一起庆祝了自己20岁的生日，他为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而欢呼，过完生日后，他就乘船去了波恩，在那里他又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第三章 发现了叔本华

他教导过的，已成为过去了；
他体验到的，将永世长存；
看看他吧——他一向不听命于任何人！

上面这首诗是尼采为叔本华而写的，在尼采的哲学思想里，叔本华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

1865 年晚秋的某一天，对尼采来说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当他在莱比锡街头漫步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家旧书店，这书店是尼采的房东开的，他走了进去，在里面他看到了一本书《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书出版于 1819 年，作者是叔本华。他随手把这本书抽出来，打开一看，禁不住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书中充满了忧郁、苦闷、绝望的气氛，尼采喜欢这悲凉的格调，在内心深处他好像与作者交流了很久，甚至连作者的文风和文体，尼采都十分喜爱，他将这本书抱在胸口赶回家中。后来他曾对这件事回忆道：“回到家后，我便靠在沙发上读起了刚刚得到的那本珍贵的书，我开始让那本有力但沉闷的天才之作占据我的心。书里的每一行都发出了超脱、否定与超然的呼声。我看到了一面极为深刻地反映了整个世界、生活和我内心的镜子。”

在那以后的两个星期中，尼采一直深陷于对叔本华哲学

的思考中，他每天直到深夜两点钟才上床休息，第二天早晨六点就起床，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叔本华的著作完全把他给迷住了，他废寝忘食地咀嚼着书中的每一句话，好像是那位先哲专门为他而写的。

叔本华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生于 1788 年。死于 1860 年，当尼采读到他的书时，这位哲学家已死去了近六年。《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书是叔本华的代表作，就是靠这本书，叔本华成了唯意志论哲学家的开山鼻祖。在叔本华的这部著作里，他通过对社会、对人们的长期观察；对前人的哲学思想进行总结和研究，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命题，一个是“世界是我的表象”，一个是“世界是我的意志”，他从一个极端的观念主义者出发，以为世界只是主体的观念，认为世界这个观念本身也是我们的思想所赋予的，甚至整个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是意志的发现，万物的运动就是意志的表象，或者说是意志的客体化。

依叔本华看来，人便是求生意志的工具，意志是不能遏止的盲目冲动，就是欲求。这种欲求是无限的，永远难以满足，今天满足了，明天又有新的追求，又开始不满足了，如此不断循环，所以人就永远处于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所谓拥有，只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的满足而已，而所谓幸福，只是遗忘一时的痛苦罢了，人多活一天就会向死亡靠近一点，一直到生命的结束。叔本华认为只有两条途径可以使人摆脱痛苦，一是艺术，人在进行艺术欣赏或艺术创作时，人就摆脱了意志的桎梏，摆脱了痛苦，但这是暂时的，当从艺术中清醒过来，痛苦就又接踵而至了。摆脱痛苦的另一种方法就是

禁欲，就是自愿地放弃性欲，甘于痛苦和死亡的寂灭，使人生摆脱意志的束缚，否定了生命意志，人也就可以彻底永远地摆脱痛苦，而达到不可动摇的安宁，在寂灭中找到极乐。叔本华的最后结论是：“没有意志，因此就没有表象，没有世界。于是留在我们之前的，怎么说只是一个虚无。”

叔本华有遗传的神经质，如对黑夜的恐怖、无缘无故的沮丧、暴躁的脾气，他对人生的悲观态度与他自己的气质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这种气质，使他无法保持一个愉快的人生观。而且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死亡的浪潮汹涌的时候，整个欧洲都被拿破仑的铁蹄践踏过，只留下一片荒凉和废墟。所以叔本华怀疑，是否有一个仁慈的上帝，甚至生命本身究竟有没有意义？

叔本华的这些思想在尼采的内心引起巨大的共鸣是不足为怪的，尼采少年时代就忧思多虑，父亲和弟弟的接连去世，四处搬家飘泊，使他对人生怀有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而且他的个性喜欢对哲学问题和人生进行积极的思考，在他对人生的意义还没有完全思考成熟的时候，叔本华的一整套悲观哲学体系，不仅使他惊叹不已，而且让他崇拜有余。尼采本来对基督教义和上帝产生过怀疑，所以他从叔本华那里得到了一个强大的支持，这种支持使他的精神世界获得了充实感，他再也不必为自己对人生表示不满的思想而自责了，相反，他能积极从容地看待人生的痛苦了。

在读完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之后，尼采在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生活中含有苦难，我们越是想享受生活的一切，也就越会成为生活的奴隶。所

以我们都抛弃生活中的享乐并实行节制，对自己缩衣节食，对他人则宽容仁爱，正是因为我们怜悯那些在受若受难的人们啊！”

应该说，叔本华对尼采的哲学思想甚至整个人生都起了重大的影响，叔本华是青年尼采的伟大导师。自从读了叔本华的第一部著作之后，尼采又把叔本华的其他著作仔细地从头至尾阅读了几遍，与每一位思想探索者一样，尼采在前辈的行列中找到了一位知己，而这位知己又激励鼓舞着他去继续探索前人没有走完的路。虽然尼采在早期的著作中，对叔本华的著作充满了赞誉之辞，但在他后期的著作中这种赞誉就渐渐地消失了。甚至走上了与这位精神导师相反的道路。叔本华是站在否定生命立场上的思想家，而尼采在后期的学说中则是肯定了生命，他主张去战胜人生的痛苦，完成人生的意义。

尽管如此，尼采一直对叔本华充满了敬意，他曾告诫周围的人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深深感觉痛苦的人，一定要懂得叔本华。”同时，尼采在心灵深处佩服叔本华的人格，他称赞叔本华有一种高贵的诚实感，深刻的洞察力和惊人的一贯性。而且叔本华从不妥协、从不蛮横的学术态度给了他深深的震撼。

与叔本华一样，尼采在个性上也与世格格不入，他们都属孤独的人，叔本华直到生命的暮年，也没有多少人理解他，更没有人去买他的书。他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竟被人当作废纸卖掉了。尼采对叔本华这个天才在心里充满了理解和同情，这种理解和同情就像是对自己的理解和同情一

样。也许是命运的巧合，也许是平庸时代的共同特征，伟大的思想家在他的学说刚诞生时总是不被人理解，甚至误解，他们有着高贵的禀赋、卓越的才识，不为普通的众人所引导，相反，他们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对着大众疾呼，可是他们的声音却总是被当时喧嚣的潮流所吞没。叔本华是如此，尼采也是如此。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叔本华在孤独困苦中，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而尼采却在疾病和忧思中，被折磨成了精神病，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不被人理解，又不可能理解别人的疯癫中渡过的，直到死去的时候，他才彻底摆脱了孤独和痛苦。

值得一提的是，叔本华是一位对女性非常讨厌的人，他对女性的很多偏见对尼采也产生了影响，尼采在以后的著作中也对女性表示了厌烦，不过，有趣的是，就在尼采如醉如狂地沉缅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中的时候，他再一次堕入了情网。他在交际场合认识了一位到莱比锡作巡回演出的女演员拉贝，他被这可爱的艺术家吸引住了并深深地爱上了她。为了表现自己对这位女演员的深情，尼采给她寄去了一首自己谱曲的歌，并附上了热烈的献辞。不过，由于尼采天性孤独而敏感，忧郁而羞怯，他很容易便推翻了自己的想法，再加上这个时期他受到叔本华悲观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并没有去为爱这个演员付出更多的行动，最后这件事毫无结果，不了了之。

第四章 从军生涯

尼采从军的时间很短，而且由于身体的原因，每一次服役也没有真正到期就半途而废了。但是这些短暂的从军生涯丰富了尼采平淡的人生经历，也给他的一些哲学思想带来了启示。

尼采第一次当兵是在 1867 年，那一年初春，尼采尊敬的姑妈萨丽·尼采去世了。尼采的心里又多了一层无形的哀伤。不过这个时期，他经常收到好朋友戈斯多夫在军队中服役时写来的信，这些信给尼采带来了一丝安慰。就在这个时期，普鲁士王国为了把德国统一起来，给德国资本主义提供一个迅速发展的环境而与奥地利帝国爆发了普奥战争。战争开始后，大批年轻的德国人纷纷应征入伍，尼采无心在校听课了，他甚至比其他的一些人更迫切地希望入伍，他认为：“当祖国进入了生死存亡的战斗的时候，在家里坐着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这样，尼采便成了德国应征入伍的年轻人中的一员。由于尼采身体较差，眼睛又近视，所以他入伍时十分勉强，只是他的近视眼镜度数正好在当时普鲁士参军标准以内，他才侥幸过关。这年 9 月，尼采被征收为兵。10 月份，尼采在瑙姆堡的地方炮兵部队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志愿兵服务。刚进这个部队里，新兵每天除半小时午饭外，要从早晨 7 点训练到晚上 6 点，由于尼采身体差，上级给了他照顾，让他享受了

每天住在家里的待遇。这样，每天晚上他都可以继续学习。他曾说：“即使我回家时筋疲力尽，浑身汗水，可只要一看到桌上洛德送的叔本华的照片，我就感到了宽慰。”在当兵训练的紧张日子里，叔本华这个精神偶像给了尼采训练下去的勇气和决心，这也可以说是叔本华的唯一意志主义给他带来的思想和行为上的双重影响。

到 1867 年底，尼采已经在瑙姆堡炮兵部队里练习了 6 个星期的队列和骑术，他准备接受军官考核，真正当上一名军官，并为此作了刻苦的准备。

尽管军营的生活是紧张而富有朝气的，但尼采天生的忧郁和孤独并没有因此而缓和，在他内心深处，总是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孤凄向他袭来，这是任何军事训练都无法排解的。在当兵训练的这段日子，尼采找不到一个学问上的朋友，更不用说知音了，这对于热爱研究问题、思考问题的尼采来说实在是一个痛苦不堪的事。他在给好友洛德的信中感伤地写道：“在瑙姆堡，我太孤寂了，熟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语言学者或是叔本华的热心崇拜者。”

为了排遣胸中的苦闷和孤单，尼采一个人在训练的间歇阶段，仍然手不释卷，刻苦学习。在这个时期，他主要研究的是古希望的著名哲学家德谟克利斯，并受到了这位唯物主义哲学家朴素原子论的影响。由于柏拉图和基督神学都拼命攻击过德谟克利斯，认为他的思想极为危险，这倒使越来越不信奉基督教的尼采，更对德谟克利斯产生了兴趣。在对德谟克利斯研究后，尼采把他看作成了一位想把人类从对上帝的崇拜与恐惧中解救出来的革命者。而且他称德谟克利斯是

第一位懂得将科学方法论应用于道德范畴的哲学家。

受到德谟克利斯的影响，尼采进一步发展了他在普夫达读书时就已经产生的怀疑批判精神，他开始敢于勇敢地否定前人的东西了，他要打破所有的偶像和权威，准备去开启新的世界。他是这样说的：“文学史上研究的一些成果，这仅仅是因为人们不能再满足只得到一种回答了，他们要不断地提出问题。”

不仅如此，在军训的这段时间，尼采的否定意识也越来越坚定了，在对德谟克利斯进行研究的文章中，尼采写道：“我们用怀疑主义为传统思想掘下了坟墓，而由于怀疑主义带来的这些结果，我们寻找出被隐落了真理，而且也许再次发现传统的思想是正确的，尽管它凭着一双泥脚站立着，因此黑格尔主义者会说我们在企图通过否定之否定来说明真理。”

正当他对德谟克利斯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心得体会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1868年3月，在军事训练时，尼采不慎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胸部肌肉被严重拉伤了，受伤那天，剧烈的疼痛曾两度使尼采昏迷过去了，他躺在病床上呆了十天，军医为他动了手术。由于这次事故，尼采幻想成为军官的美梦破灭了，不过，他在伤愈不入，就升任为一等兵了。他的身体刚一复原，又开始了学术工作。这时候他开始写作第一篇哲学论文——《康德以来的目的论》。在这篇文章中，尼采以康德为起点，对康德以下的各种目的论学说进行了全面归纳，他认为即使世界上生命形式种类之多，使得人难以相信他们都是演变的结果，也没有必要去假

设自然现象背后有什么预先安排好的计划。

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刚完成，尼采又遭到了一次打击，那时，他觉得因骑马摔伤的胸部总是隐隐发痛，有时疼痛得难以忍受，于是他又去请医生看病，医生经过诊断后发现他在三月份的骑马事件中已经损坏了胸骨，而且炎症开始渗透进了骨骼。听到这个消息，尼采如五雷轰顶，他万没想到已经十分虚弱的身体还会再遭受如此巨大的打击。他的心情变得更加阴郁起来。根据医生的建议，尼采必须再次接受一次手术。在母亲和妹妹的照顾下，尼采被送到海尔会诊，在那里，医生对他进行了水浴治疗。由于尼采的积极配合，这次治疗取得了较好效果，以后尼采的胸部也没有发生过较大的问题。尼采在海尔接受治疗后，就返回到了家乡瑙姆堡。

骑马受伤，虽然使尼采当军官的幻想破灭了，身体也受到了伤害，但是却也带来了益处，那就是尼采在卧病五六个月内，有了充裕的时间进行对自己感兴趣问题的大胆研究，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日后，他的妹妹伊莉莎白回忆说：“那次危笃的重病，给哥哥带来了莫大的恩赐，在这半年中，他享受着完全自由的生活，不为大学的课程左右，也无需为学业或交际耗费时间，从繁重的军务中解放出来，一心沉潜于自我孤独之境，遂倾全力于哲学问题的思考，这段时期所撰写的文献学论著，也不知不觉带有哲学意味。”确实，这段自由的时间，使尼采有可能静下心来过滤自己的思想，对很多平时的灵感作深入细致的思考和归纳整理，这为他以后写作深奥的哲学论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尼采从瑙姆堡炮兵部队退役后，刚好满 24 岁，他又重新

回到了莱比锡大学，在莱比锡大学他发表了关于语言学的演说，受到了师生们的好评。由于他语言学功底扎实，工作又非常努力，所以莱比锡大学的不少人，都以为他在未来的语言学上必大有可为，成就一番事业。尼采也把心从部队里收回来，决心刻苦奋斗，为的是将来能在莱比锡大学当上一名讲师。

尼采第二次入伍，是在 1870 年秋天。那时，北德意志联邦进一步把德国境内所有的诸侯国统一起来，为德国资本主义和发展扫清障碍，而当时的法兰西帝国却不希望德国强大起来，他们想以战争来阻止德国的统一，限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还可以转移自己国内日趋激烈的内部矛盾，普鲁士和法兰西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普法战争是德国和法国历史上一次重大而有影响的战争，对尼采来说这也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大事件，成了他的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尼采出生于萨克森州的洛肯镇，在政治上萨克森属于普鲁士，所以他的国籍也应属于普鲁士，但是，由于他在 25 岁，即普法战争的前一年，他已赴巴塞尔大学作客座教授，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必须将国籍移到巴塞尔大学的所居国家——瑞士，所以尼采实际上只能作为瑞士籍的青年来参战。他身体受过伤，加上体质天生孱弱，所以他这一次参战只能作一名看护兵。

1870 年 8 月中旬，尼采与朋友莫森格尔去参加医疗救护训练，经过十来天的学习，他基本上掌握一些护理常识，并学会了一些常用药物的用途，这些知识对他以后帮助治疗自己的身体带来了方便。这一年的 9 月初，尼采和莫森格尔被

派往前线救护伤员。他们坐火车一直走了两天，才到达了前线。沿途上他看到了战争的可怕结果。他在给瓦格纳的信中说：“我乘坐的是一节破旧的运牲口的车厢，有六个重伤员，我一个人整天和他们在一起，给他们包扎，护理他们。这些伤员有的子弹穿过了他们的骨髓，骨头被打碎了，有的人负伤四处，还有的人皮肉都腐烂了，现在看来，当时我能从那些腐烂的臭气中幸存下来，并且居然还能睡得着，吃得下饭，真是奇迹。”这些可怕的战争感觉使尼采对战争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抵触甚至反感的情绪。

1870年10月，普鲁士军队向法军展开强大攻势，法国将军巴赞被迫在梅茨投降，普军向法国北部大举挺进。面对着普鲁士军队的胜利，尼采不仅没有感到高兴，相反他对德意志的前途和发展问题都感到了忧虑，他甚至写信给好朋友洛德，劝他从普鲁士的军队中赶紧逃回来。德国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尼采对整个战争的厌弃程度越来越加深了，他在给朋友戈斯多夫的信中说：“我很担心我们将来的文化情况，我认为现在普鲁士对一切文明国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形势。”普法两国的交战，以及双方的大量人员死伤，使尼采对人类的战争越来越感到不好理解，同时也加深了他对德国文化是一种野蛮无知文化的认识。

1871年1月28日，法国被迫投降，普法两国签订了停火协定。德国迫使法国签订法兰克福和约，德国从法国掠夺到50亿金法郎的赔款，而乘普法战争大获全胜的余威，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竟到法国首都巴黎凡尔塞宫称德意志帝国皇帝，而尼采认为这是一个浮夸而庸俗的行为，当全德国人都

陷于爱国主义的激动时刻时，尼采却带着厌恶这场战争的心情在一旁冷眼旁观。在此之后，尼采在自传里对普法战争中胜利德国进行了严肃而冷静的批评，他说：“德国文化没有意义，没有实质，没有目标，只不过是所谓的‘公共舆论’。再没有比这更坏的谬见，以为德国军事胜利乃是教育文化的成功或以为这样就比法国文化还优越。”

可以说普法战争使尼采加深了对德国文化的更进一步了解，这些了解形成了他以后很多著作观点的基础。

正是通过第二次当兵，尼采的哲学思想有了感性上的基础，尽管尼采对德国的胜利并不感到高兴，相反却是悲哀，但是那些凯旋的普鲁士军队威武雄壮的神态又使他深深地感到：最高最强的生命意志并不表现在可怜的生存竞争当中，而是表现在作战的意志当中，表现在权力和优势的意志当中。他把这种意志归结为一个“要”字，要战斗，要权力，要超过一切的权力。这就是人最本质的东西，是生命的意义，是意志的价值，所有这些内容都成了尼采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正是在军队生活和严酷战争条件下，尼采才发现了世界上许多事物和现象的某些本质上的东西。

普法战争结束之后，尼采就回到巴塞尔大学重新执教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当过兵，他的部队生涯至此就彻底地划上了一个大句号。

第五章 年轻的语言学教授

1869年2月，著名的语言学家李奇尔教授，给巴塞尔大学写了一封推荐信，热情地举荐尼采作为巴塞尔大学的教授，李奇尔教授在信中说：“39年来，我亲眼看见许多优秀的青年发展着，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像尼采这样年轻而又如此成熟、灵敏……如果他能长命，我可以预期他将成为德意志文献中的最杰出人才。他现在才仅仅24岁；健壮而有活力，身心充满了勇气……他在莱比锡整个青年古典语言学者的领域，已成为崇拜的对象。”当时的巴塞尔大学也很愿意拥有一批年轻而又极富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学者，他们充分相信李奇尔的慧眼，决定采纳这位语言学学术权威的意见，把尼采聘为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的客座教授。

尼采早在波恩大学时，就与李奇尔教授相识，他从小十分佩服尊敬这位治学严谨、富有艺术气质的著名语言学家。尼采在波恩大学之所以放弃神学而专攻古典语言学，可以说很大程度受了李奇尔教授的影响。1865年4月，李奇尔教授到莱比锡大学执教，尼采也跟着李奇尔教授转到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

1866年11月，尼采响应李奇尔教授的号召，参加了由李奇尔教授提议成立的学生语言俱乐部，当时参加这个俱乐部的有11人。他们定期开会讨论，交流学习心得。在一次讨论

会上,尼采就西奥格尼斯诗歌的初版问题作了一个论证严密、观点新颖的发言,发言完后,尼采把这篇发言稿送去给李奇尔教授审读。读完这篇发言稿,李奇尔教授十分兴奋并深受感动。教授认为这是他所读过的低年级作品中最为生机勃勃而且构思最严谨的文章,他为自己的得意门生的杰作欣喜不已。受到李奇尔教授的夸奖后,尼采心中也充满了喜悦,自那以后,他相信自己确有研究语言学的天赋,他开始更加发愤地用功了,他每周抽出两次时间与李奇尔教授讨论语言学问题,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增长了关于语言学的很多见识。

在李奇尔教授鼓励下,尼采又开始了写作关于西奥格尼斯论文的任务,他花费大量时间收集了关于西奥格尼斯的众多资料,并用两个月时间完成了这篇论文。这篇论文发表后,引起了李奇尔教授等许多人的热烈赞扬,尼采的同学们也对这篇文章推崇备至。取得这些成绩后,尼采并不满足,相反,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去了。1866年10月,尼采开始研究戴奥格尼士(也就是他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的酒神),与此同时,他还想到柏林去攻读博士生课程。第二年八月,他来到柏林,并完成了有关戴奥格尼士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尼采第一次对古希腊的酒神戴奥格尼士进行了大胆的解释,认为它是希腊艺术的重要根源。这篇论文发表后,使人耳目一新,尼采的声誉再次鹤起,他在学术上的名声越来越响亮。为了鼓励尼采的研究精神和勇气,更由于他论文的优秀,校方决定给尼采授奖,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尼采并没有去参加授奖仪式。但是为了鼓励尼采在学业上的成就,莱比锡大学还是决定免试授予尼采博士学位。

1869年2月，尼采带着博士学位，正式开始了在巴塞爾大学的执教生涯。来到这个人才荟萃的大学后，尼采就发表了一篇题为《荷马与古典语言学》的演讲。那天，在巴塞爾大学博物馆的主厅里，挤满了人群，人们都想看看这位年轻教授的真实水平。而对着众多的专家和学者，尼采毫无怯意，他侃侃而谈。在这场演讲中，尼采勇敢地认为：语言学不是一门纯科学，而是与艺术紧密地交织重叠在一起的。这种对古代文化的理想化也许是源于日耳曼人对于南方的怀旧情绪，然而古典主义者应该填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他申明了自己的信条：“所有的语言活动都应当孕育于并包含在某种哲学世界观之中，这样，在个体或彼此分离的细节像所有能被抛弃的东西那样消灭之后只剩下它们的总体，即一致性。”这些天才的思想，像一阵春风吹进了人们冰封的心田，大家给予他的演讲以热烈的掌声。他深刻的观点深深吸引了听众，同事们对这位年龄只有24岁的教授也开始刮目相看。

由于尼采才华横溢，巴塞爾大学给予了他莫大的关怀和照顾，他每月薪水高达500瑞士法郎，同时，巴塞爾上流社会也向他敞开大门，名门贵胄之家争相邀请他去演讲，参加宴会。尼采常常应接不暇。尼采身穿崭新的燕尾服，胡子理得干干净净，在舞场上翩翩起舞，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受人尊敬、前程无量的青年学者。

然而，在巴塞爾大学呆了不久之后，尼采就对社交和应酬感到了腻烦，甚至对他心爱的语言学兴趣也大减，他对语言学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就像过去他曾否定过神学一样，现在尼采又要否定语言学了。对李奇尔教授，尼采也认为这

位恩师的研究范围过于狭窄了。也许是天生的原因，尼采并不是一块当学者的材料，他不愿意整天埋在书堆里去啃别人的旧东西，他喜欢新奇而深刻的东西，他对生命和人生的价值等问题思考得极为深刻。自然界的风声、雷电、雨雪都能使他一颗灵敏多愁的心变得躁动不安起来，他不安的灵魂总在寻找什么，凡是到手的都不是他所要寻找的东西，他渴望找到一片使自己内心无限满足的空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尼采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个多面体，组成他自己的各个部分总是处于矛盾之中，他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同时，他又对同时代的人极不满意，他动不动就用“庸俗”这个词批评他的同代人。从这个时期开始，这个哲学天才的孤独之树开始越长越大了。在叔本华诞生 81 周年时，孤独的尼采曾给好友洛德去了一封长信，来发泄心中的忧苦，在信中他说：“今天是叔本华的生日，除了你以外我再没有更亲近的人可以谈心了，我生活在一片孤独的灰云里，特别是在聚会的时候，我无法拒绝人情应酬的压力，不得已在会场上和形形色色的手拉在一起。在这样的聚会里，我总是听到吵吵嚷嚷的声音，而找不到自己的知音，在这地球上，怎能叫我忍受这个大染缸。这种庸俗化的空气，扰乱我的神经。而所有身边的相识，竟没人体察到我的感觉。这些人呼我为“教授”，他们自己也被这头衔冲昏了，他们认为我是太阳底下最快乐的人。”

尽管在巴塞尔作教授，尼采常常感到深刻的孤独，但是他仍有幸结识了几个朋友，这些朋友给他送来了欢愉和鼓励，他心中的悲苦因此有所减轻。

在这些朋友中，布克哈德是与尼采最要好的一个。在尼

采到达巴塞尔的第二年，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到了布克哈德先生的演讲，顿时，他被这位比他年长 26 岁、学识丰厚的长者深深地吸引住了。从此，他们互相来往，经常交换彼此的意见和新的思想。1871 年，发生了使欧洲震惊的巴黎公社事件，当时起义的工人树立起政权，著名的卢浮宫美术馆也失火了，听到这些消息，尼采产生了无可名状的震惊和悲伤，他四处寻找布克哈德，而与此同时，布克哈德也在寻找他，当他俩见面后，他们关在房间里热烈地讨论时事，最后两个人竟在房间里痛哭起来。后来尼采在回忆布克哈德时，称他是自己“最亲近的同事”，并且说他从布克哈德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另外，巴塞尔大学的同事、著名神学家欧佛贝克也是这个时期里尼采的重要朋友，他们两人同住一栋公寓，经常彼此照顾，形同手足，欧佛贝克一直到尼采快死时都与他保持着友谊，是尼采的一位忠诚朋友，其中，欧佛贝克对基督教世俗文化的勇敢批判，给了尼采很大的影响，以后尼采的哲学著作有很多观点也借鉴了好朋友欧佛贝克的。

第六章 与瓦格纳相识

尼采一生中最有名的朋友要数瓦格纳了，他在学生时代就很喜欢瓦格纳的作品，因为尼采喜欢瓦格纳的音乐力度与美的表现。他对瓦格纳歌颂战争和男性果敢的作品倍加赞赏，他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说瓦格纳：“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惧怕。”说瓦格纳是唯一的一个真艺术的开创者，瓦格纳是第一个把各种艺术熔铸成综合美的人。另外，他在《悲剧的产生》中也对瓦格纳进行了赞扬，他说：“从德意志精神的酒神本性中涌现了一个和苏格拉底的教化格格不入的力，自巴赫到贝多芬，自贝多芬到瓦格纳，这个力在盘旋着，好似太阳永远在大宇宙中运行一般。”尼采在 17 岁便开始研究瓦格纳的歌剧《特莱斯坦和伊索尔德》，并且还经常在钢琴上弹奏剧中的动人乐章。尼采在自传《瞧？这个人》中，曾写过这样的话：“我考虑所有事物之后，发现如果没有瓦格纳的音乐，那么我的少年时期以后，就决不能继续活下去，因为我似乎注定不适于生活在德国人的社会之中。”由此可见，瓦格纳对尼采产生过多么大的影响。

在当时，瓦格纳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德国音乐界的奇才，他综合了浪漫主义的幻想，国民乐派的民族观念，以及泛神论的宗教思想，再加上他那特殊的和声与配乐等表现方法，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音乐理论，这种理论表现在他所创立的

“乐剧”上，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由于瓦格纳很早就入莱比锡大学研究哲学，对于实用美学又仔细钻研过，所以他的作品不仅技巧高，而且思想性非常强。更重要的是，瓦格纳性格独特，思维方式与一般人不同，常常能在作品中表现常人难以表现的思想，而且非常大胆，这使当时对德国现状和文化严重不满的尼采非常高兴，他庆幸在叔本华之后，又找到了一个精神伴侣。

早在普夫达求学时，尼采就开始喜欢关心瓦格纳的各种作品了，他总想见到这位心中的偶像，但是总难发现一个好时机。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尼采终于有了认识瓦格纳的机会。

1868年11月8日，对尼采来说是他生命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天。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会见了德国著名的音乐家和文学家——瓦格纳。那时瓦格纳因为怕被世俗烦事打搅过多，正隐居在他的姐姐家中。两位天才相遇后，进行了长久的热烈的交谈，他们谈的最多的是他们共同喜爱的叔本华哲学。事后，尼采在写给朋友罗德的信中说：“啊，你可想见，他以难以形容的热情谈论叔本华，说他感谢他，说他是懂得音乐本质的唯一哲学家，这对我是何种的享受。”尽管那时瓦格纳已是著名的作曲家、诗人，又是政论家、哲学家和革命家，而且他又受着国王的极度宠爱，但这样并不妨碍两人的交往。相反，瓦格纳对这位比自己小30岁的年轻语言学家、教授很感兴趣（与瓦格纳相识时，尼采24岁，瓦格纳55岁），叔本华哲学和音乐成了他们初次相识的介绍人。尼采后来曾把瓦格纳称为“叔本华在精神上的兄弟”。

结识了瓦格纳之后，尼采就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一位知音，他不再为自己的孤独生活而悲咏长叹了。他经常去瓦格纳家里，拜访瓦格纳和夫人柯西玛。瓦格纳夫妇那时正侨居在瑞士的卢塞恩湖的特里伯森。尼采每次来，他们都把他奉为上宾，并为他专门准备了两间房子，供他来时休息起居。那时候的瓦格纳正处在创作的高峰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西格弗里德》等著名乐章。瓦格纳踌躇满志，他想用自己的作品来进行一场音乐事业的革新，使自己做一个时代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把才情纵横的尼采的出现视为命运赐给他的最大恩惠，称尼采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懂得他的心愿、理解他思想的人。

对尼采来说，结识瓦格纳也是非常幸运的事，因为从瓦格纳身上他看到了叔本华的哲学，瓦格纳的音乐为叔本华的哲学作了最好的注解，让尼采感到了一种生动形象富有动感的哲学旋律，而叔本华的哲学又为瓦格纳的音乐加进了深沉丰富的底蕴，让瓦格纳的音乐飞上了超世俗超时代的高空。

尼采对瓦格纳的崇拜和喜爱，除了音乐和叔本华哲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尼采对德国文化的不满。

尼采所处的时代，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笼罩着思想界，达尔文学说征服着世界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普鲁士军队在欧洲大陆建立了德国的强权政治。1870年德意志首相俾斯麦发动普法战争，迫使法国签订法兰克福和约，德国从法国掠夺到50亿金法郎的赔款，而用于加强兵力及军备工业的发展。1871年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这个帝国逐渐建立在“铁与血”的基础上，而成为一个军事专制的国家。尼采对于德意

志走向强权政治、军国主义的倾向极为不满，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宣传的：“我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

普法战争之后，尼采对德国文化越来越感到失望。他在给朋友罗德的信中说：“我们这整个低劣的文化统统掉到了一个很可怕的恶魔手中了。”普法战争后的气氛，使尼采十分忧虑，他认为俾斯麦的强权政权是一种野蛮的统治，他批评俾斯麦“这批大人物，已经把德国这具有丰富感觉的民族，导向了误途”。他引证歌德的话说：“我们德国人还是在昨天，无疑地，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我们一直在非常勤奋地开掘着我们自己，我们的人民才能吸收到足够的知识和比较高级的文化。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都还是一些野蛮人。”

在尼采的所有书信中，凡是提到德国的地方，无不大肆加以抨击，而毫无赞许之词。他以为生活在当时的德国，使他的健康被破坏了，心理平衡被破坏了。他甚至以辛辣的口吻说：“每逢我在德国的时候，我对人们的厌恶便增长到了可怕的地步。”

正是对德国俾斯麦政权和德国文化的强烈不满，使他与瓦格纳走到了一起。早在尼采 16 岁时，他就听了瓦格纳的一个歌剧《惶莱斯坦》，对这个歌剧尼采非常喜欢，他认为瓦格纳的这个歌剧与众不同，很具有个性，一点也不“德国化”。从此以后，他狂热地喜欢上了瓦格纳的作品，他对瓦格纳所能创造的令人惊奇的作品，推崇备至，以为那是他灵魂深处所要表达的东西，他的一颗高傲的心找到了共振的频率。对此，他在其自传中也充满感情地回忆道：“我与瓦格纳的最初

接触，也是我生命史上能够自由呼吸的最初时刻，我受他的影响，我尊敬他，我把他当作一个与德国人不同的人，我把他当作一个与‘德国式美德’相反并具体反抗‘德国式美德’的人……瓦格纳也是一位革命人物——他摆脱了那些德国人。”

在尼采看来，他对于瓦格纳所创造出来的各种天才之作，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得更清楚，同时对于那些只有瓦格纳才能达到的奇妙狂喜，他比任何一个人了解得更清楚。同时对于那些只有瓦格纳才能达到的奇妙狂喜，他比任何一个人了解得更清楚。他自豪而充满感激地说：“我把瓦格纳看作我生命中最大的恩人。我们两人都遭受过，甚至透过彼此的手而遭受过比这个世纪大多数人所能忍受的更大苦闷，这个事实乃是把我们两人结在一起的连系物，而这个连系物将永远把我们的名字连一个起。因为，正如瓦格纳只是德国人其中的一个误解一样，我也是如此，并且将永远如此，我亲爱的同胞们，你们必须先具有两世纪心理和艺术的熏陶……但是，你们永远不能将时钟的针拨回来。”

尼采与瓦格纳过从甚密，除了互相拜访和讨论外，他们还在学业上互相予以指导。尼采把与瓦格纳的每一次相处，作为自己学习叔本华的哲学实习课。瓦格纳热情地向尼采推荐了一大批被当时德国人冷落了德国古典学者。尼采在巴塞尔大学图书馆里仔细地查阅了他们的著作并作了大量的笔记。同时，瓦格纳为了让尼采更好地了解他，拿出了他自己早斯所写的关于美学和哲学方面的杂文，让尼采阅读。

由于受到瓦格纳的影响，尼采关于希腊悲剧的思想开始

有所改变。他在自己写的学术笔记中接受了瓦格纳的许多观点，比如他以下的一些观念就与瓦格纳的十分相同：歌剧旋律的发展是对音乐的一种叛逆，绝对音乐与日常戏剧是音乐剧的两个分支，悲剧是纯音乐的产物……这个时期，尼采认为：正如叔本华是自柏拉图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那样，瓦格纳代表了现代音乐发展的最高峰。

1870 年，尼采认为，悲剧性音乐戏剧将在德国得到复兴。在瓦格纳夫妇的鼓励下，他准备为他作公开演讲的主题写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后来的名作《悲剧的诞生》。

第七章 第一部哲学著作的诞生

1872 年 1 月，尼采收到了他平生出版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

早在尼采 24 岁时，他就受到了李奇尔教授的赏识而荣任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教授之职，这时尼采可以说已是一个优越的古典语言学者了，他在巴塞尔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对古籍产生了大量的新奇而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的综合，成为了《悲剧的诞生》的主要内容。在这本书中，尼采通过对古典语言的研究得出了别开生面的崭新结论，他充满激情地指出，只有在美感现象中，生命和世界才显得有价值。在《悲剧的诞生》中，美感价值成了该书所认可的唯一价值。而这种美感价值也成了他日后对生命加以肯定和礼赞的思想根柢。

尼采在这部光辉的著作中，着重探讨了生命意义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只有靠艺术才能拯救生命，也只有艺术才能赋予生命的一种审美的意义。为此，他提出了两个观念，一个是阿波罗（Apollon，又译为日神和太阳神），另一个是戴奥尼索士（Dionysus，又译为酒神）。尼采通过对古典文献学的研究，他提出了前人所未有的新见解，他以为所有的希腊艺术都是由阿波罗和戴奥尼索士这两种精神的互相激荡而产生的。所谓阿波罗和戴奥尼索士只是希腊人在艺术上

所崇拜的两个神，尼采认为在日神阿波罗的恬静幽美光彩四射之中，希腊人形形色色地梦幻被唤醒了，于是他们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形成了种种艺术冲动，并在造型艺术上取得了特有的成就。这里，尼采把阿波罗当作了人的梦幻世界产生的源泉，他以为正是阿波罗神支配了人们内在梦幻世界的美丽形象，在冷酷的现实世界上，涂上了一层美学的面纱，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形式与美的世界而戴奥尼索士则是酒神，它是生命之流的象征，它会冲破一切障碍，排除一切限制，它代表了奔放的生命活力。在酒神戴奥尼索士的庆典中，人们互相簇拥着，载歌载舞，沉醉狂欢。酒神使人的情绪激昂兴奋，在激奋的情怀中，人的个体意识开始解体，并产生了一种宇宙中“大我”的体验，人因此感到已超脱了人生，从痛苦和毁灭中获得了悲剧性的快感。酒神戴奥尼索士的典型的艺术形态，就是悲剧和音乐。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将阿波罗和戴奥尼索士作为平等的两个神祇来看待。他认为阿波罗精神表现出一种静态的美，这种美把苍苍茫茫的宇宙化成理性上的清明世界，并借其梦幻的驰骋，而后又以生命中之无限生命力贯穿于静性的世界之中，把平面的结构贯穿而成立体的结构。这种生命的律动，从希腊宗教上的戴奥尼索士暗示出来，并通过狂醉的酒神，贯注于理性的世界中，形成了音乐和歌舞的冲动。

尼采大胆地宣称，希腊文化的最高成就，就是阿波罗艺术（史诗、雕刻、绘画）和戴奥尼索士艺术（音乐、舞蹈）的结合。这两种精神相互冲激而产生了深邃沉厚的悲剧，希腊文化最高的智慧就表现于它的悲剧之上。

这种悲剧的最高形式是人羊神（人体羊头神）的合唱，在合唱中，大家共同踩着舞步，手舞足蹈，用一种音乐的节拍，来渲泄心中的感情。这种人羊神的合唱，是由戴奥尼索土的狂醉勾起了阿波罗的幻想，进而把潜伏在生命里层的活力激发出来，让狂热的情绪克服生活的困苦的忧患，产生出创造的冲动，这就是希腊悲剧精神的所在。

在这里，尼采对于希腊文化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见解，他在自传中说希腊人不是悲观主义者，悲剧确切地证明，在这点上叔本华是错误的……在这本书上（《悲剧的诞生》），有两个特殊的发现：第一，在希腊文化中把握了戴奥尼索土现象——第一次对于这现象提供了一个心理上的分析，以此视为一切希腊艺术的基础。第二个发现是对于苏格拉底思想的解释——在这里他第一次把苏格拉底认定是希腊文化衰落的关键，视为颓废的典型。在这里面，尼采对叔本华和柏拉图等人进行了批判。尽管尼采受叔本华影响很大，但在这个阶段，他已开始对叔本华的悲观厌世思想进行了摒除。通过对古希腊古典悲剧的分析，尼采认为希腊人洞察了人生的惊险可怖，但是他们并不背离人生，相反，而是面向人生。希腊人借助于日神和酒神精神，对世界予以了肯定。艺术拯救了希腊人，通过艺术，希腊人重新获得了生命的意义。他并且进一步描述说：“希腊人创造了许多神祇，以显示他们对于生命的肯定，透过阿波罗之美的动力，渐渐地从原始的恐怖，发展出奥林匹斯众神的喜悦统治，犹如玫瑰花从荆棘丛中萌芽一样。不然，一个如此过度敏感，如此情绪激动，如此深受苦难的民族，怎能忍受人生呢？那显示人生完满，并保存

存在价值的艺术冲动，产生了奥林匹斯世界，这世界实为反映希腊意志的一个变形镜。”通过对希腊悲剧精神的这种赞美，尼采对生命予以了热情的肯定，他不像叔本华那样，视生命的根本为毫无意义和目的的盲目意志，尼采对生命采取了一种乐观主义和积极奋斗的态度，他并不否认人生的孤独、困难与痛苦，但他因为人能够将自己置身于历史舞台而感到了由衷的喜悦。他竭力借艺术来肯定人生，认为人生是一种悲剧，但也是一种美，人生的意义就在这悲剧的美感中。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还集中抨击了苏格拉底的科学主义的人生态度，同时对基督教也进行了攻击。尼采发现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那就是从前的哲学史都以为希腊哲学盛期是由苏格拉底而柏拉图再到亚里斯多德的时代。尼采以为这是一个十分荒谬的观点，他认为希腊哲学的高峰时期只属于前期，因为希腊后期的哲学只是在象牙塔上制造概念，这不是真正的哲学。在尼采看来，真正的哲学是应该从健康的精神上发泄出来的。

同时，尼采还在该书中指出，从中世纪100多年以来，人们都只以为希腊文化唯一的精神是阿波罗精神，以为希腊文化只是阿波罗理性之光的发射。其实这也是错误的。以此为依据，尼采进一步指出不仅当时的德国人不了解希腊精神，而且希腊人也误解了他们自己，尼采以苏格拉底作为典型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没有悲剧精神，并且毫不了解古希腊的诗歌，只知道荷马叙事诗上平易浅显的庸俗理论，而荷马史诗中的悲剧英雄则被苏格拉底化成了平淡无奇的俗人。尼

采痛惜地认为，苏格拉底之后，不仅哲学衰落了，艺术也渐趋暗淡了，很多作品中的原始悲剧精神，已趋近于平凡而没有激动人心的艺术魅力了。而且，希腊作品在苏格拉底之后，热情与火焰被冻结住了，变成了有光而无热的僵硬形态，充满活力的酒神戴奥尼索士的精神也消失了，只剩下太阳神阿波罗的精神在勉强支撑着，从此，具有创造活力的希腊开天辟地的精神便跟着丧失殆尽了。尼采对希腊文化的衰退充满了同情，他把这笔帐都记在了苏格拉底身上，称苏格拉底时代在哲学上是一个平庸的非理性的时代，在艺术上则是表现得非常浅薄的喜剧。这种浅薄的喜剧“剥夺了音乐中伟大的戴奥尼索士意义”。

可以说对苏格拉底的批判和对酒神戴奥尼索士的肯定和追念，成了《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同时这种批判与肯定也成了贯穿尼采整个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突出的主线。由酒神戴奥尼索士意志，其后发展成了尼采超人动力的“冲创意志”，由戴奥尼索士精神，而后发展成了尼采后来所反复强调的“战斗精神”。而戴奥尼索士现象，则成了后来尼采批判基督教文化的病态和近代文化庸俗性的基本动力。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虽然没有提及基督教，但是对基督教却是表现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在尼采的自传中，提到《悲剧的诞生》时，他明白地说：“全书的特色是对基督教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敌意的缄默，基督教既非阿波罗式的，也非戴奥尼索士式的；它否定一切审美价值——而这正是《悲剧的诞生》一书所唯一肯定的价值。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它

是虚无主义的，可是在酒神戴奥尼索士的象征中，却是达到了最大的肯定。”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对世界所作的审美解释，与基督教论点正好相反，他认为所谓上帝的绝对真理，是将所有的艺术都丢弃在虚伪的领域之中了。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基督教的价值系统，不仅是反对艺术的，而且还包含着对“生命的极端仇视”。它是“一种病入膏肓、阴郁、疲惫以及生物由于缺乏阳光而变得苍白的现象”。可以说《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经过长期的思索后，对基督教作出的初步的进攻。尽管这种进攻的火药味没有后期的著作中那么大，但是尼采毕竟在思想探索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除以上所述之外，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还对整个西方的近代文化表露了不满的情绪。他认为：“西方文化的每一个时期，即使表面上看来是属于原则性而值得称赞的，但当它和希腊的典型比较时，就失去了光彩和生命。”他批评整个西方近代世界是在亚历山大文化的笼罩之下，在对眼前的各项事物作着十分平庸化而且毫无价值的颂扬。他把整个西方文化看成了一个毫无生机衰老的沙漠，他渴望把古希腊的戴奥尼索士精神注入西方的文化肌体，使之再生。在对西方文化精神进行批评的同时，他对德国的文化更是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他满怀激情地期望：“在现代文化荒芜的废墟上，能透过音乐艺术的神奇而看到德国精神恢复活力和净化的一线希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尼采发表《悲剧的诞生》的一个动机就是，他感到德国人在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方面已趋于枯竭，他忧虑德国文化和希腊文化之间的联系太薄弱了。实际上的

情况也是如此，在当时德国的许多大学里，很多人对希腊文化都严重疏忽而不去做严肃的研究，他们不仅放弃了希腊人的理想，而且有时还完全曲解了所有古典研究的真正意义。后来，尼采在回顾《悲剧的诞生》一书的写作过程时曾说他对当时的所谓有“德国精神”是“持着一种无望和无情的观点”，认为德国精神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缺乏希腊精神的。

《悲剧的诞生》一书出版后，引出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有的人理解，有的人极力反对。尼采在巴塞尔大学的许多同事对尼采出了这样一本荒诞的书表示出了冰冷冷的沉默，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寄予厚望而且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竟然写出了这样一本全然不合古典语言学学术传统的著作，他们对此感到惊讶和失望，连他的恩师李奇尔教授也没有对他表示理解。在《悲剧的诞生》发表后，尼采曾给自己的老师李奇尔去信说：“我觉得您一生中，若遇到过什么充满希望的东西的话，也许就是这本书了，尽管有些人会受到打击，但是这部书是我们古典问题研究的希望，也是德国的骄傲。”尽管李奇尔教授没有当面批评尼采的这些语言，但是他在日记中评价尼采时说，尼采已是一个“自大狂”了。

《悲剧的诞生》发表后不到四个月，尼采在普夫达高等学校的同窗，以后成为德国文献界巨擘的青年学者维拉莫维奇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将来的文献学》，猛烈地攻击《悲剧的诞生》，对尼采在该书中的哲学观点和语言学知识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以此来捍卫古典语言学的传统。但是尼采对这个攻击并不戒意，他没有给予答复，而是委托朋友洛德出面进行反击。几个月后，好友洛德发表了一个小册子，反驳了维拉

莫维奇对尼采著作《悲剧的诞生》所进行的攻击。

尽管尼采十分自信，但是学术界对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这部著作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由于学术界对这部书的排斥，以致尼采的学术威信一下子从地上落到了地下。一时间，他的学生们纷纷离开他。这一年的冬天，他吃惊地发现没有一个专攻古典文献学的学生选修他开设的关于古希腊诗人荷马的研讨班和讲座课。

在尼采的少数支持者中，瓦格纳是最热烈的一个。由于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把他的朋友瓦格纳偶像化了，甚至神圣化了，所以瓦格纳夫妇对《悲剧的诞生》是以感谢和感动之情热烈欢迎的。同时，以瓦格纳为中心的音乐家、诗人、学者们，即所谓瓦格纳的同党们也对这本书鼓掌响应。瓦格纳在《悲剧的诞生》刚发表时，就立即给尼采写信说：“我还不曾读过比你的书更精彩的东西，亲爱的朋友，书中的一切都好极了。”

《悲剧的诞生》所引起的学术界的猛烈批评和恩师李奇的冷漠，曾一度使尼采的内心非常难过，但是瓦格纳等人的支持又使尼采充满了自信心。他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坚持走自己的路。

1872年二三月间，尼采不顾学术界对他的冷漠，他在巴塞尔大学的《论我们的文化设施的前途》为题作了五次学术报告，他集中火力进一步批判了现代文化。在报告中，尼采认为，德国政府只是在表面上关心提高文化水平，但是实际上是想降低教育水准。教育在国家手中会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他认为现代国家并不想改善国民的文化素质，相反只是

想让人民驯服恭顺、满足现状，只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科技人员而不需要让他们掌握一般的人类文化。因此，尼采不相信普及教育能够解决民族文化的问题，相反他认为科学分工正在毁灭文化。他说，新闻学是一种传播知识、淡化知识的手段，真正的哲学家应当使学生接触了解希腊文化，还要反对“庸俗文化”，尼采在这些报告中还批评说，德国人使用母语的能力太低，学校提倡的是书生气而不是真正的文化。

在所有这些报告中，尼采都主张德国的教育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否则它将发展到自我潜力无法发掘和蒙昧之中去。同时，他对当时的学术界进行了批评，指出他们具有各自职业的狭隘性。

尼采的这些报告吸引了不少人，每次听众都没少于 300 人，瓦格纳夫妇和其他许多贵宾都出席过他的报告会。这给尼采的心灵带来了安慰。

也就是这个时候，巴塞尔大学再次提高了尼采的薪金，他的年俸从 3500 瑞士法郎提高到了 4000 瑞士法郎。

第八章 与瓦格纳的决裂

尼采与瓦格纳的友谊，是在特里普森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出版之年（1872 年）为最高峰。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到瓦格纳家中参加宴会，与瓦格纳夫妇一同探讨哲学问题，这是尼采一生里最值得回忆的日子。1872 年当他准备离开特里普森时，尼采曾充满感情地给友人戈斯多夫写了一封信：“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的生活一直是与特里普森联在一起的，我一共来这里访问了 33 次，这些访问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没有这些拜访，我会成为怎样的人呢？我非常高兴我已经把特里普森给我带来的生活反映到我的著作之中。”离开了特里普森后，尼采与瓦格纳的友谊开始走下坡路。

1872 年 4 月，瓦格纳夫妇也离开了特里普森，他们来到拜路特，在那儿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国家歌剧院。瓦格纳开始热心于自己的音乐会演工作，与尼采的交往比过去少多了。尼采每次来见瓦格纳，他都大谈特谈自己的会演工作，吹嘘自己是如何的了不起，他对尼采试图与他讨论的哲学问题毫无兴趣，这使自尊心极强的尼采深感压抑，在心理上渐渐产生了对抗情绪。对尼采来说，由于自己走的道路，是与老师瓦格纳的意图相合的，因此他希望得到瓦格纳的保护和宣传。但是在瓦格纳来说，对尼采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优秀教授，只期望他成为一名宣传工作者，为他瓦格纳脸上贴金，成

为他万千崇拜者中的一名而已。

在这样的关系下，尼采与瓦格纳过去那种亲密的情景再也难以看到了。与此同时，尼采以《瓦格纳在拜路特》为题，写下一篇文章表达他对自己心目中的大师的批判态度。为了照顾瓦格纳的面子和他们之间的友情，尼采在这篇文章中还是充满了对这位作曲家的赞美，而把对瓦格纳的批判和疑惑蕴含在文章的内部。在该文出版前，尼采曾犹豫过一段时间，但是为了证明友情的真实，在崇高信念的驱使下，尼采还是毅然出版了该文。遗憾的是瓦格纳夫妇已习惯了别人对他们的赞美，他们只看出了文章里对他们的歌颂，而丝毫没有发觉出文章里对他们进行怀疑和批判的意思。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对尼采触动很大。德国年轻的音乐新秀勃拉姆斯（后来成为了著名的音乐家）到巴塞尔指挥演出，但是瓦格纳对这位年轻人毫不迁就，他对这位后辈进行了无情的挖苦和嘲弄，这使尼采心中非常不快，在笔记中他对瓦格纳的人品极为不满，他这样写道：“这个专横的人，除了他自己以外，对别人的人格包括亲近的朋友，都不尊重。”同时，他在心里对瓦格纳的艺术也产生了抵触情绪。

1874 年圣诞节，瓦格纳一家热情地邀请尼采去作客，但是尼采拒绝了，他回到了故乡瑙姆堡，与家人过了一个愉快的节日。

1876 年秋天，德国决定在拜路特创立音乐节，演出瓦格纳的全部作品，尼采希望在这次演出中能看出瓦格纳有所改变，于是他兴致冲冲地赶去参加了。在参加瓦格纳的歌剧《尼布龙根的指环》的彩排时，由于尼采的眼病很重他只能闭

目用耳朵欣赏台上的表演,但是其结果却让尼采深感失望,他无法忍受该剧本浮夸庸俗的风格,于是他在中途退出来,独自徘徊在近郊幽静的森林里。在拜路特住了几天之后,他就不再也不想看瓦格纳的歌剧了。他在给妹妹伊莉莎白的信中说:“我急于离开这里,再住下去是荒唐的,我害怕参加这里每天晚上长时间的艺术活动,可是我还是都出席了……我已经忍受得太多了。我本来就不该从一开始就参加进来,在这儿除了折磨我什么也得不到。”他终于离开了拜路特,到巴伐利亚的森林中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去了。

当尼采的心灵得到了大自然的抚慰后,他再一次来到了拜路特,而这时瓦格纳的音乐正在大演特演。在这里,尼采只看到了为成功而陶醉的大人物的傲慢,对瓦格纳盲目崇拜的愚昧的人群,而瓦格纳那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惧怕”的大胆艺术风格已荡然无存,尼采原本期待瓦格纳能成为一个文化的挽救者,但是他完全失望了,瓦格纳不仅没有去和低劣的德国文化进行抗争,相反他在迎合德国人的口味。这个时期瓦格纳的歌剧几乎成了人类心灵的软化剂,皇帝以及悠闲富裕的人们,都成了瓦格纳迷,簇拥在瓦格纳周围为他欢呼,那些铺张的场面,庸俗的捧场,让尼采失望至极。在瓦格纳音乐的庆祝大会上,尼采带着黯淡的微笑含着泪对妹妹说:“啊!伊莉莎白,原来这就是拜路特!”最后尼采迫不及待地离开了被庸俗气氛充溢着的拜路特,以后从没有回去过。这件事对尼采伤害很大,他后来曾写道:“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恢复健康,而瓦格纳是我唯一的病痛。”

尼采终于抛弃了瓦格纳,这对尼采来说既是一种痛苦,又

是一种自慰，因为他再不必成为别人的附庸，而要成为他真实的自己了。

从本质上看，尼采之所以崇拜瓦格纳是因为他希望古希腊的悲剧精神能在瓦格纳的音乐中复活，但是当瓦格纳没有按照尼采的希望去做，相反他把自己的音乐风格转向去颂扬基督教道德时，尼采的精神支柱也就垮了，他与瓦格纳的分手也成了必然。此外，尼采与瓦格纳的分手，也说明了尼采对德国文化有着深切的痛恨，不管是谁只要与德国文化靠近了，尼采就把此人看成了精神上的异路人，精神上—疏远，友情也就自然疏远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尼采的自传中可以发现明显的痕迹，在这本书里他曾这样说：“瓦格纳竟然也变成了德国人，瓦格纳的崇拜者已经超过瓦格纳本人了——德国的艺术！这位德国的名家！德国的啤酒！……在我们当中，那些非常清楚的在瓦格纳披上了德国式美德的外衣时，都被弄得迷糊了。我想，我是知道崇拜瓦格纳的那些人的，我已经验过三代这样的人，从以往那位把瓦格纳与黑格尔混合在一起的布兰德尔到现在这些把瓦格纳与他们自己混在一起的拜路特新闻界的理想主义者。从那些‘美好的心灵’那里，我听到过各种关于瓦格纳的自白，那些群众真够使你毛发倒竖。可怜的瓦格纳，他已经走到一种什么地步了？但愿他已经沦入鄙贱人们的手中，可是，他却沦入德国人手中！总有一天，为不启发后代人，他们确应充满一种真正的拜路特作风，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在精神上保留拜路特作风——因为这正是缺乏的东西——而附以下面的话：‘日耳曼帝国所赖以建立的精神典范’。”由此可以看出，尼采与瓦格纳绝裂主要是因为

瓦格纳向德国文化作了妥协，使尼采对瓦格纳寄予的厚望成了泡影，这让尼采无法容忍。

1876年11月，尼采在索伦托偶然遇上了瓦格纳，这是他们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瓦格纳当时正热衷于创作剧本《帕西法尔》，并对参与宗教活动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他热情地向尼采吹嘘自己，但尼采对他十分冷淡，因为尼采在瓦格纳身上看不到一丝宗教信仰的诚实，他认为瓦格纳的行为只是大人物虚有其表的演员般的行为，是一种戏子作风。

这一次分手后，瓦格纳又亲自给尼采寄来了他的剧作《帕西法尔》，但是尼采仍然未对瓦格纳自认为的得意之作表示丝毫兴趣。他在给一位朋友瑞哈特的信中这样评价道：“昨天瓦格纳把他的新作《帕西法尔》送给我，初读的印象是它倒像李斯特而不像瓦格纳本人的作品——充满了反改革的精神。对于像我这样习惯于希腊式的普遍人性视野的人看来，这剧本是太基督教化了，太狭窄了。里面充满了种种奇谈怪论，没有骨肉，而有太多的血水（尤其是最后晚餐一幕简直是血淋淋的）。我也不喜欢歇斯底里的女主角……语言好像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但是那种场合和表现方式——岂不是极高尚的诗？岂不是把音乐发展到了最远的限制。”

作为对瓦格纳寄来《帕西法尔》的回报，尼采把自己写的一本新书《人性的，太人性的》送给了瓦格纳。在这本书里，尼采对瓦格纳进行了尖刻的批判，只是没有点出他的名字，他说“这位艺术家像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给自己提出了要使人性幼稚化的任务。这是他的光荣之所在，也是他的局限性之所在”。他认为天才人物容易误认为自己是超人，因

此，一位名人如果不去用自我批评来自我约束就会逐渐变得不负责任。瓦格纳的夫人科茜玛收到尼采的书后大为不满，她说这本书她只读了几页就发现尼采已经把她长期以来所反对的东西作了登峰造极的发展。瓦格纳本人收到这本书后，更是恼火，他专门给正养病的尼采寄去了一篇自己写的文章，在文中瓦格纳不指名地大肆攻击《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以报复尼采对他的攻击。但是尼采并不在意，因为他在内心深处已不愿再和瓦格纳交往了，他在送给瓦格纳《人性的，太人性的》书上就写过这样的话：“朋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结合我们。我们所走的路子完全相反，但只要有一个人的方向足以使别人的方向获得进展，我们就会彼此觉得快乐异常……于是我们俩人像并排的树一样成才。我们彼此友好，才能不受压抑地成长。”

尼采终于彻底地与瓦格纳决裂了，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大幸，因为他已完全摆脱了瓦格纳的影响，思想上发生了大转折。自此，尼采逐渐地走向他自己，开始创造出自己的天才哲学思想。

第九章 女人与鞭子

尼采一辈子都没有结过婚，但是在他一生中他与一些女性交往过，并产生过良好的友谊。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尼采是举世闻名的反女性主义者，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正确。

尼采从 5 岁开始就一直与母亲、妹妹、姑妈和祖母生活在一起，可以说他是在家中圣洁的女性中养育成长起来的。他小时候的唯一游伴是他的妹妹伊莉莎白，由于整个少年时期都环绕在女性的周围，所以他几乎被塑成了一个女性般柔弱而敏感的人。

当他年龄大了以后，他曾试图改变自己柔弱的个性。在 20 岁他进入波恩大学时，他开始广泛地交友，希望把自己的社交圈子扩大一点。另外，他还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勇敢地与过去的一位熟人进行了决斗，结果使自己鼻梁受伤，在家里躺了好几天。此外，他还积极报名加入了学生团体，和其他的男孩一样，热衷于击剑、饮酒、聚会、跳舞、结交异性，但是所有这些活动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忧郁而敏感的个性，因为他天性就似乎不愿过喧闹的社交生活，也不愿与一般人一样过一种平庸而无为的生活，这种思想也给他结交异性带来了麻烦。在他 19 岁那年，他与少女安娜·莱德爾相识，并产生了恋情，但由于他们年轻不懂事，这段恋情很快就划上了句号。

在波恩大学时，尼采还经历了一件奇特的事，有一次他到科伦城游玩，请了一个仆人带路，他原想找一家饭店，但是领路人却误把他领进了一家妓院。后来他的朋友保罗·杜森在他的《尼采的回忆》中，记录了尼采对这件意外事件的叙述：“我突然发现自己被半打浓妆艳抹的动物包围了，她们都以期待的眼色凝视着我，在这刹那间我完全惊呆地站在她们的前面，后来，好像本能的驱使，我走到钢琴旁边，那是在这一群中唯一有灵魂的东西，我弹了一两个和弦。音乐恢复了我四肢的活动，在这瞬间，我跑出户外。”从这一段话里，我们猜想尼采对一般的女性并不感兴趣，甚至有点厌烦。

在巴塞尔教书时，尼采又结识了女演员拉贝。他认为拉贝实现了女性的理想，他诚恳地爱着她，但是由于尼采那个时期正迷醉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他又羞怯、敏感，他们俩终于没有能够走到一起。

与拉贝恋爱失败后，尼采陷进了更深的孤独之中。这个时期，由于过度地写作，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特别是他的胃常常疼痛，头部也发痛，而且，一发作就是好几天。这种状况几乎把尼采摧残倒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天白天我都累极了，到了晚上什么生活的欲望都没有了，生活是如此艰难使我感到吃惊。”由于疾病的折磨，尼采停止了所有的读书和写作，并且停止了在巴塞尔大学的授课。在这段痛苦的日子里，尼采常常感叹自己被可怕的死神包围了。他曾渴望能够结婚，找一个心爱的人来照料他，帮助他度过余生。

1876年三四月间，为了治好自己的病，尼采在日内瓦湖畔疗养。这时，他结识了荷兰少女玛蒂尔德。之后，他约这

位姑娘到日内瓦的郊外散步，他们停留在那里达数个小时之久，谈得非常热烈。玛蒂尔德犹如一阵清风吹进了尼采干枯的心灵，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激情，他急于攫取这一美好的刹那，于是在相识了短短的一天后，他就写信求婚，要求对方做他的终身伴侣；“我们生活在一起，岂不比各自单独逗留着要好些吗？”这理由确是十分动听，但是这位纤弱羞涩的少女那敢冒然接受这项大胆的要求呢，她既惊诧又兴奋，最后她拒绝了尼采的求爱，拒绝的理由是她已经和别人订了婚。

这一次，是尼采过份着急了，他的行为也太突然了，叫人一下子难以接受，这一次求婚的失败使尼采更加失望了。他对女人的戒备心理也日趋严重起来。

好友戈斯多夫非常关心尼采的婚事，一次他写信告诉尼采，有一位年轻而美貌的富家小姐非常喜欢尼采的作品，同时因为她对尼采具有如此的好感而拒绝了许多求婚者。刚听到这一消息时，尼采有点心动，但是想到上一次求婚失败，他便心灰意懒起来。他谢绝了戈斯多夫的好意，在回信中尼采说：“我不要结婚，我讨厌束缚，更不愿介入‘文明化’的整个秩序之中去。因此，任何妇女都难以自由之心灵来跟随我。近来，独身一辈子的希腊哲人们，时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这是我应该学习的典范。”也许是从这个时候起，尼采开始认为女人是难以理解他的，而他也不想再去为女人花费更多的心思了，正像他自己的诗中所写的：“要去找女人吗？请带上你的鞭子。”他又开始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著书上，恋爱的烦恼渐渐消失了。

但是尼采的妹妹对哥哥的婚事表示了极度的关心，她写

信来要哥哥尽早结婚组成家庭，但是尼采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了。他在给妹妹伊莉莎白的信中说：“我的脑病之坏，超过了我过去的想象……结婚固然是我所期望的，但那是非常不可能的，对此，我自己十分清楚。”

另外，尼采忠实的女友梅森堡夫人也曾替他多方物色合适的对象，（梅森堡夫人比尼采大 28 岁，先后与赫尔岑、瓦格纳、罗曼·罗兰有亲密交往），这位夫人极富友情，且温柔善良，她四处奔波，终于为尼采介绍了一位女友。

1882 年 4 月，在梅森堡夫人和另一位朋友雷埃的多次邀请下，尼采来到了罗马旅行。在那里，两位朋友把一个富有魅力、极其聪慧的俄国少女莎乐美小姐介绍给他，做他的学生。莎乐美小姐时年仅 21 岁，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将军家庭，曾就读于著名的苏黎世大学。尼采与莎乐美小姐相遇后，他竟情不自禁地堕入了情网，同时，莎乐美也被尼采的独特个性所吸引。两人结伴到卢塞恩旅行。沿途，尼采向莎乐美娓娓叙述往事，回忆少年，讲授哲学，但是，羞怯的性格使尼采不敢向莎乐美表露心曲，于是他恳请朋友雷埃替他求婚，殊不知雷埃自己也爱上了莎乐美，这使尼采十分难堪。

尼采的妹妹伊莉莎白却看不惯莎乐美，对她表示了不满，她们两人甚至在路上发生过冲突，互相责骂。尽管如此，尼采仍对莎乐美一往情深，他向莎乐美表示：“我相信我们之间唯一的差别是年龄的差别，我们的生活经历相似，对问题的看法也一样。”他约莎乐美在耶拿附近的特坦堡乡间的松林里进行了多次谈话，有时甚至长达十个小时。他们除了进行思想交流外，其他的主要话题则是宗教问题，尼采对莎乐美的

资质极为钦佩，他在给朋友奥佛贝克的信中，高度赞颂了莎乐美。他说：“在思想与情趣方面，我们之间有强烈的互相吸引力以及很大的共同之处，但是也存在能对彼此都产生启发的不同见解，也许像我们之间的这种开诚布公的哲理探讨过去从未有过。”

但是尼采的妹妹却与莎乐美的关系日趋恶化，她对莎乐美与哥哥的友谊满怀妒恨，恶意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批评莎乐美时说：“我不能否认她（莎乐美）使我哥哥的哲学带上了她的色彩。这种唯我主义的哲学践踏了一切挡路的东西。”

由于妹妹的干预，加上莎乐美只是尊敬和崇拜尼采，并没有下定决心嫁给尼采，所以她与尼采的关系逐渐疏远，他们相处了五个月的美好时光后，结果不欢而散。尼采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以为我已经找到了一位能帮助我的人，当然，这不仅需要高超的智力，而且还有第一流的道德，但是相反的，我们却发现了一位只想娱乐自己的人物，她还不害臊，梦想把地球上最伟大的天才作为她玩弄的对象。”从这里可以看出尼采对莎乐美表示了极端的不满。当莎乐美离开他后，尼采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算是彻底地完结了。遭受这次恋爱打击后，尼采的心境倍感凄凉，他独自一个人前往直意大利的热那亚，打算在那里度过冬天。那时他心中灰暗到了极点。他在给朋友盖斯特的信中诉苦说：“即使在这里，我也未能完全摆脱今年这场恶梦带给我的打击，我感到寒冷、病痛，我在经受着巨大的折磨。”

这是尼采恋爱过程中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打击。从此

他开始远离异性，再也不愿结婚。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您的儿子不适合结婚，我所需要的只是保持独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痛苦和孤独中，尼采犹如一只流浪的小船，在生活的大海中四处飘泊。他找不到爱，也找不到理解，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这书上有这样两句话很好地反映了他对女性的厌倦：“掉到谋杀者手上，岂不比堕入女人的梦幻中更好些吗？”

他再也不愿和女人打交道，更不用说去结婚了。他开始拼命地写作，在他的著作中，这时出现了不少反女性的诗句，但这些反女性的语言都经过哲学化了，换句话说，尼采反女性的言论，只是出自于哲学的观点。比如他说：女人是件玩具，纯洁而精巧，像块宝石，闪耀着未来美德之光辉。

女人的一切都是谜，一切都只有一个答案——那便是生育。

男人应畏惧爱他的女人，她会奉献任何牺牲，其他的一切似乎对她都毫无价值。

男人应畏惧恨他的女人，因为男人在他内心最深邃的灵魂仅是邪恶的，而女子却是败坏的。

女子最恨什么人？——铁片对磁石说：“我最恨你，因为你有吸力，但你的吸力不够强，不能把我拖到你的身边。”

男人的快乐是：我要；女人的快乐是：他要。

一支无言的箭，射向广漠的苍穹，而半途中，一个女人从上面掉下来。

在尼采与莎乐美的交往中，他认为莎乐美是“梦想把地

球上最伟大的天才作为她玩耍的对象”，这使尼采对女性失望到了极点，他甚至对女性的才智都表示怀疑，以为女性是没有足够的智慧欣赏天才的。女人对于男人，只是无思想的美色的诱惑，或者只是感觉的东西罢了，然而她们的感觉也是脆弱的，不可靠的。

于是，在尼采的心目中，理想女人的幻影彻底破灭了。

第十章 最黯淡的日子

1879 年，是尼采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年。这一年的春天，尼采那幼年时就经常犯的头痛病又开始无情地向他猛袭过来。有时，一次剧烈的头痛可以让尼采十天不得安宁。在头痛的时候，尼采的胃病也开始发作，不管他如何控制自己的饮食，他总是呕吐不断，他的心灵几乎承受不住这种可怕的折磨。他给母亲和妹妹写信说：“我的眼睛糟糕得使我无法再教课，头痛的情况坏得就更无需再提了。”他甚至感到自己能够继续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在朋友们的劝告下，他决定去疗养并接受治疗。这一年的 3 月，尼采来到了美丽的日内瓦。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他想使自己的身体变得好起来，心情也能够变得愉快些，遗憾的是，日内瓦湖畔的美丽风光并不能使尼采感到轻松和愉快，相反，他的烦恼变得更厉害了。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我的生活与其说是力图恢复健康，还不如说是饱受折磨，我所想的就是‘但愿自己是个瞎子’的傻念头，因为我本不该再读书了，可却不能不读下去，正如我现在理应让大脑休息，却总是苦苦思索一样。”由于在日内瓦疗养无效，尼采只好又重新返回到巴塞尔，这时他发现自己的眼睛视力进一步下降了，到医生那里一检查，果然如此，这使尼采十分担忧。为了使自己的身体能尽快恢复过来，他向巴塞尔大学校长辞去了在

该校的教授职务。从此，他再没有做过教授。关于这一点，尼采在其自传中曾这样说到：“在我 36 岁时，我的生命力达到了最低点——我仍然活着，但我看不到 3 步以外的地方，那时候——1879 年，我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

离开了他在那里成名的巴塞尔大学后，尼采的心里充满了落寞的情绪。为了排除心中的苦闷，尼采与妹妹伊莉莎白到了佰尔尼。在那里因妹妹另外有事，他便与妹妹分离了。然后他开始了自己独自在欧洲各地的漫游。从此以后他一直都在欧洲过着漫游的日子。夏天，他就去欧洲的高山地区；冬天，他就回到温暖的地中海地区。这些漫游生活使尼采的心理情绪得到了长期的调整，也帮助了他以后的创作。

1879 年 6 月，尼采到达了海拔 1800 米的圣马利兹山区，这里人烟稀少，空气新鲜，尼采感到了一种从所未有的清静。在这里他几乎中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过着形同隐居的生活。这时他在给妹妹信中写道：“我与外界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每天只在自己的房间里进食，几乎不能吃什么，只喝大量的牛奶，我认为这样会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我打算在这里长住一段时间。”除了大部分时间呆在房间里外，尼采偶尔也到外面去散步。每次散步时，尼采都独自一个人走很长的路。在山间宁静的小道上，尼采可以不受打扰地纵横驰骋自己的思想，独处的生活让他感到了一种思索的快乐，甚至感到了孤独的美好和可爱，这个时候，他的身体也开始有所好转，他又不想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了，而是想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说：“你是了解的，我所偏爱的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生活方式，而现在我愈加渴望这种生活

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解除我的痛苦，我需要真正的工作，那种可能慢慢地做，可以不致引起精神紧张并能使人不疲劳的工作。”尼采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就已经按照信里的意思行动了，他开始了写作《人性，太人性的》一书的第3个部分。正当他一个人在写作中自得其乐的时候，他的老朋友欧佛贝克专程赶到了圣马利兹，两个老朋友见面后，彼此都格外高兴，他们一连畅谈了几个小时，尽情地表达了相互的思念之情。在欧佛贝克探望尼采的这段时间，他发现了尼采的一个新特点，那就是尼采总喜欢一个人沉思默想，似乎在他心中总装着一件放不下来的事情，同时，从尼采的口中，欧佛贝克还了解到尼采有越来越不愿与人群混合的想法，而喜欢过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独生活。

1879年9月，尼采完成了《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三部分《漫游者及其影子》。然后他把这篇文章的手稿寄给了朋友彼得·盖斯特，并在信中说：“我的病使我不得不考虑突然死去的可能性……在某些方面我感到自己像个衰弱的老人，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下了我的生命之书……从根本上讲，我已经检查了自己的生活观。”

盖斯特收到尼采的手稿后，就积极为他誊写，并忙着为他找出版社出版。此时尼采也觉得在圣马利兹疗养后，身体已经基本上复原了，于是他从圣马利兹走了出来，然后他又专门到彻尔去看了看妹妹。他的这一次突然来访使妹妹非常高兴，另外她还惊喜地发现哥哥看上去很精神，精力充沛，气血健康，已经恢复了他那刚毅率直的性格。看完妹妹后，尼采又单身一人回到了故乡瑙姆堡，他在那里租下了一座古塔

和一块田地，每天早晨起床后，他都去自己的田地做做园艺工作，他觉得这种劳动他能胜任，同时也感到特别愉快。不过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他的眼睛又发病了，这迫使尼采不得不放下他心爱的园艺工作。正在这个时候，尼采收到了盖斯特替他抄写好的《漫游者及其影子》的全部稿件，他非常惊喜。在来信中，盖斯特还对尼采的文稿提出了许多建议，希望尼采能予以采纳。看完盖斯特的信后，尼采认为他提的建议都很有价值，于是他接受了盖斯特的意见，对原稿作了不少改动。稿子修改以后，尼采又把稿子重寄给了盖斯特，让他再发表意见，同时，他还在附信中告诉了他关于《漫游者及其影子》一书的写作过程，他说：“除了个别地方以外，这部书都是我在散步时间内完成思考的，并且是用铅笔在六个小记录本上起草的。”

《漫游者及其影子》最后被盖斯特完全抄好了，尼采把它交给了出版商什玛茨奈，让他帮助出版，什玛茨奈愉快地答应了，到年底这本小册子就顺利出版了。

这本书刚刚开始发行时，尼采的头痛病又发作了，同时他的胃也开始痛起来了。他每天不想吃任何东西，剧烈的头痛，使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即使喝一点牛奶，马上就又呕吐出来。一连几天，他的身体得不到任何营养。每天他只有卧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着房顶上的楼板，听外面虫鸟的啼鸣，这位思想上的巨人被疾病折磨得失去了全部的活力。他没有精力思考，体重减了十几磅。这年的圣诞节，尼采的健康情况进一步恶化了。那一天，尼采不仅不能吃任何圣诞食品，而且还总是呕吐不止，这使陪伴他的人心痛不已。尼采

就这样过了一个痛苦的圣诞节。他的呕吐持续了半个月，一直到12月底才有所好转，当他不再呕吐时，他的精力已经全部被耗尽了，他没有力气做任何事，渐渐地他又陷入了昏迷的状态。

当尼采再一次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此时，他发现自己的眼睛比以前更近视了，而且他的脸像是被刀削过一样，骨头都凸现出来了，全身没有一丝儿气力，他好像从死神那里走了一趟，又被抛回到了人间。这一场大病，使他的心灵被一种沉重的哀伤浸透了，以致在他以后生命的日子，总是感到自己离死亡已经不远了。

尼采在其自传里曾对这些可怕的，如梦魇般的日子作过记录，他说：“那段时候，我就像个影子，在圣马利兹山区过了一个夏天，又到瑙姆堡度过了一个冬天，这是我生命中最黯淡的日子。”

在这个生命最黯淡的时期里，尼采对生命的本身感到了一种从所未有的危机，他对科学的公正、人生的意义、真理的相对性、错觉的必然性等等形而上的哲学问题，都觉得虚无缥缈，无从把握，即使他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但他也开始怀疑这种思考的本身究竟有没有意义？他的自信心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回忆说：“当时我第一次学遁世者的说法了……完全没有把听者当作问题，只是不为沉默苦恼而说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生命中最黯淡的日子里，尼采的精神完全消沉了，对人生充满了悲观主义的观念，根本没有后期的强劲有力的“超人”思想和“冲创意志”。那时他对生命只是一种敷衍，是在苟延残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这段时期，我只谈和我无关的事，而且谈得好象永远和我有关系似的”。

从尼采的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尼采写作《漫游者的影子》时，他已经感到了自己的生命就要结束，他对人生的一切苦恼已非常清楚，也觉得无能为力，只是他假装不知道这种人生的苦恼，而是用一种假面掩饰了内心的悲哀。这种假面并不是尼采本身的狡猾，而是他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存在不得已的行为，是出于自己保护的需要。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尼采了。

第十一章 在曙光中寻觅欢悦

“善与恶乃是上帝的成见，”蛇说罢，急忙逃去。——摘自《尼采诗选》

尼采在 1879 年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奈，他把这一年称为“最黯淡的日子”。过了这痛苦的一年后，尼采的身体开始有了好转，他的心情也变得愉快起来。

1880 年初，尼采决定去风和日丽、气候宜人的地中海沿岸休养，以便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好些。他在给朋友艾斯尔的信中这样描绘了当时的心情：“我的生存是一个可怕的负担，我本可以早就放弃生活，如果不是因为正在这种苦难和无望的情况下，我在精神与道德上所作的试验——这种寻求知识的乐趣如此之大，使我得以战胜所有折磨和失望。总之，我比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更为愉快。”

尼采首先从故乡瑙姆堡启程，然后又到达了气候宜人的里瓦（RIVA）。在那里，他遇到了专程赶到这里来探望他的好友盖斯特，这使尼采大喜过望。在以后的一个月里，这一对好朋友经常一起在外面漫步，一同就餐，共同谈论他们的理想和哲学思想。后来，他们又一起到了风光更加美丽的水城——威尼斯。威尼斯的美好景色和友好的人们，使尼采和盖斯特的心情变得十分愉快，他们在这里尽情游玩，深深地陶

醉在威尼斯如画的风光之中。这时候，尼采的健康情况比在里瓦时更有好转，他长期以来的头痛和胃痛没有发作过，他忧郁愁闷的心情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这时候，他在给母亲的信中高兴地说：“我也许会在这儿度过夏天，这里的房屋宽敞、宁静，我睡眠非常好，我还可以尽情地享受清新的海风。”

在威尼斯的美好时光里，尼采灵感奔涌，他决定写一本新的著作了，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曙光》。

与创作《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样，尼采在写作《曙光》时，也是由好友盖斯特做笔记工作的。在威尼斯的那段时光里，盖斯特每天两次来给尼采担任口授记录，整理笔记。在这些笔记中，尼采表现了日趋明显的反基督教精神，这也是《曙光》的最主要特色之一。1880年6月初，尼采完成了《曙光》的第一部分，然后他离开了美丽的日内瓦，来到了前南斯拉夫的卡尼奥拉，然后又转到了马里恩包德。在那里他住了两个月，完成了《曙光》的第二部分。由于前南斯拉夫的气候不能使尼采感到愉快，加上他在这里视力开始下降，所以他打算找到有浓密森林的地方来恢复自己的视力，于是他又决定回到家乡瑙姆堡去。在家乡呆了1个月后，尼采的视力有所恢复，心情也有好转，于是他又决定外出旅行，这一年的10月，尼采来到了达斯特莱沙，他在这里呆了1个月，完成了《曙光》的第三部分，然后他又来到了意大利的地中海城市热那亚。在温暖的热那亚，尼采度过了他生命中一个非常不平常的夏天，就是在这里，尼采集中精力完成了《曙光》一书的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的大多数章节。尽管在热那亚停留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这段时间却给尼采留下了难忘

的印象，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后来尼采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回忆说：“热那亚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是我血肉极端弱虚的时候，我却带着愉快而焕发的心情，完成《曙光》……在这本书里，没有一个消极的字眼，没有攻击，也没有怨恨，它在阳光中明朗而愉快，像海上动物在岩石间浴日取暖一样。事实上，我就是这个海上的动物，这本书中的每一句话，差不多都是在接近热那亚的群石中捕捉到的，我独自在那里，与海洋秘密交谈。”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尼采终于在 1881 年 2 月间，把《曙光》一书全部写完。书稿写完之后，尼采又从头至尾把书稿仔细审阅了一遍，并把许多自己认为不妥当和啰嗦的部分作了修改。当把这一切工作做完之后，尼采将书稿装订整理好并寄给了好友盖斯特。盖斯特接到书稿后，十分兴奋，他一口气读完了书稿，又花了 10 天的时间将书稿誊写完毕并重新寄给尼采。尼采收到盖斯特誊写的稿件后，又重新润色了一遍，然后把《曙光》再一次寄给盖斯特，让他转给出版商，在盖斯特的斡旋下，《曙光》终于在 1881 年的夏天出版了。

《曙光》这本书共分五个部分，在第一个部分里，尼采就开始对基督教关于罪恶的教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尼采指出，在基督教看来，情欲成了邪恶与堕落的东西。基督教通过宣传信徒应对性的冲动感到内疚和自责，而成功地把爱神厄洛斯和阿芙罗狄蒂（爱与美的女神）这样伟大并使人变得高尚的典范，都贬成妖魔和鬼怪了。由于教会的禁止，魔鬼反而变得比天使和圣人更使人感兴趣，爱情故事也成了社会各阶层一致的兴趣所在。同样，怀疑也被宣布为一种罪恶，教

会所需要的只是麻木不仁和精神恍惚以及对那一潭淹没了理智的死水的无边界的讴歌。

另外在《曙光》中，尼采对柏拉图的思想也进行了集中批判。他认为“柏拉图逃离现实而只想着苍白的精神图画中的事物”，他指责柏拉图有观念狂，他说柏拉图只是偏重于形式，而且对这些形式有宗教式的狂热，尼采由此推出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是病态的结论。

在《曙光》里，尼采进一步对德国文化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他在该书《极端崇拜》一节里，对德国人的盲从、高傲和愚昧越来越感到忧愤，对德意志帝国战胜法国后所弥漫的骄盛而又浮夸的空气反感之至，他把这些原因都归咎到了德意志首相俾斯麦身上。他在《曙光》中批评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认为俾斯麦入侵法国的政策是一种邪恶的行为，说俾斯麦低估了人民的道义的力量，并痛斥俾斯麦：“这班所谓的大人物，已经把德国这具有丰富感觉的民族，导向了误区。”同时，他还嘲笑了德国的文化，说德国人不知道进行启蒙运动，德国文化是四不象，在该书第197节《德国人对启蒙运动之敌对》里面，尼采批评说：“整个德国的大趋向既与启蒙运动敌对，又与社会革命敌对。”

在《曙光》的创作过程中，尼采很多时间是在疗养，就是在疗养中他的思想才如泉水一样奔涌出来，在创作《曙光》时，尼采总在日内瓦的海边散步，在阳光照耀下的岩石上，他一个人孤独而行，很少与人说话，如同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当地的居民偷偷把那时住在阁楼上的尼采称为“圣人”，可以说孤独是对尼采这一时期心情的最好描绘，也

正是这孤独帮助尼采完成了《曙光》，同时，随着孤独的加深，尼采的思想变得更为深刻灵敏了，这种深刻的孤独在《曙光》中也表露了出来。他在该书第 154 节《不要忘记》中写道：“我们飞翔得越高远，对于那些不能飞的来说，它就显得越渺小。”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内心深处，尼采对一般的人并不愿接触，他的思想已超过了同时代的很多人，他觉得自己很难被人理解，也不愿意被浅薄的人去理解，同时，这种孤独还来源于他对德国当时的整体文化氛围极为不满，深感压抑，这使得他的孤独感更加严重，并由此产生了一种“自己是一个天才”和“我为何如此聪明”的孤傲自负感。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曙光》的第四部分当中，尼采第一次表达了冲创意志这个观念，他说：“所谓幸福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力量感。”这就是尼采“冲创意志”产生时的最初内涵，后来冲创意志成了尼采哲学的重要核心部分，构成了他全部哲学体系中的一块基石。

由于尼采对古希腊悲剧文化的赞赏，加上他对基督教义的越来越讨厌，所以他对基督教开始了大胆怀疑，这种怀疑在创作《曙光》时达到了高峰。尼采在该书第 534 节《少量药剂》中，第一次大胆地喊出了“对事物价值进行重估”的心声，并且，他在批评基督教“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中只不过是这个小角落”时，还提出了“对过去作一切价值重估”的全新观念，后来尼采在其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反基督教》中，更是发扬了这种“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勇敢精神，对基督教展开了全面而猛烈的批判。

最后一点，是尼采在《曙光》中明显地表现了自己不妥

协的战斗精神。

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就曾说：“从本质上我是一个斗士，攻击是我的本能。能做一个敌人，做个敌人——这要有坚强的性质。”在《曙光》里，尼采豪迈地说：“每天应该和自我战斗。战胜与攻克不再是你所关心的，战败也不再是你所关心的，你所关心的乃是真理。”在这里，尼采勉励人们要“自我战斗”，并关心真理，更重要的是尼采鼓励人们对知识的占有要勇敢，他希望人们成为“知识上的斗士”，为了真理和知识要勇于献身。

《曙光》与尼采以前写的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样，是用格言体写的，文字简洁，充满了哲理，尼采十分喜爱这种文风。他在自传《瞧！这个人》中，说“《曙光》是一本肯定性的书，深邃而明朗”。但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并没有引起多少热烈的反应，人们对这本书并不是特别关注，他的朋友们对这本书也没有提出更多的赞誉之词，相反，由于在这本书里尼采对基督教的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所以，看完这本书的人，对过去的道德产生了十分小心的心理。尽管在这本书里尼采对基督教道德进行了攻击，但是他采用的方式并不是偏激和火爆的。尼采后来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回忆说：“我用这本书（《曙光》）来开始我的反道德活动，在这项活动中，没有一点火药气味——相反的，如果你的鼻子很敏感的话，倒可以在里面嗅到一些令人愉快的气息，这里没有枪声也没有炮声——如果这本书的结果是消极的话，它所使用的方法却不是这样的。读者也会对这本书留下一个印象，觉得它在关于那些道德在道德名义之下一向被尊重甚至被崇

拜的一切东西，是胆小而谨慎的……”确实，在《曙光》中，尼采的语气是温和的，但是意义却是深刻的，他以一个天才的灵敏思想对道德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分析，这种分析叫人惊讶不已、感叹不止。尼采在回忆这段思想时解释说：“一直到现在，人类一直处在最坏的情况中，人是被那些不适当的东西所支配，被那些心理上弄巧成拙的人所支配，被那些狡猾的和充满仇恨心理的人所支配，也就是被那些所谓‘圣者’所支配——那些谋害世界和诋毁人类的人。利他主义被视为绝对价值而‘自我主义’则到处遭到敌视，我们要在这个事实中为下述事实找到一个决定性的证明，即教士（包括那些伪装教士、哲学家）不但在某种固定宗教范围内变成为主人，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变成了主人，同时，颓废道德，虚无主义已被视为道德本身了。”另外，尼采认为真正的道德是“无我”，如果心中有“自我”，那么，不管一个人口头上说得是多么天花乱坠，那都只是谎话。尼采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失去内心的平衡力量，抗拒自然的本能，一言以蔽之‘无为’——这就是一向被视为道德的东西。所以我以《曙光》这本书，开始我反自身牺牲道德的斗争。”

在写完《曙光》一书后，尼采还觉得意犹未尽，还有很多思想没有真正表达出来，这样在1881年的岁末，尼采又开始着手搜集写《曙光》的续篇《欢悦的智慧》的材料，并在搜集材料的同时，开始起草文稿的第一部分了。由于是《曙光》的续集，不少观点是《曙光》中观点的重复和深化，所以尼采写起《欢悦的智慧》时，速度十分惊人，到1882年1月，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尼采就完成了《欢悦的智慧》一

书的前面三部分，到6月份，尼采就接连完成了该书的前四卷。以后，由于身体又开始多病起来，尼采写作的速度才慢了。一直到1886年的10月，尼采才完成了该书的第五卷。至此，《欢悦的智慧》才全部脱稿。作为《曙光》的续篇，《欢悦的智慧》在风格上与《曙光》是相似的，而且其相似的程度非常大，都是把深刻与轻快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语言流畅舒展，节奏明快，且让人觉得亲切。尼采在谈到创作该书的体验时曾说，整部书是他的经验和激情所赋予的诗，从书中的内在“智慧”中充分显示出了无比的“喜悦”之情，他还作了一首诗，对这种体验进行了描绘：“用你炽热的枪矛，/融解我内心四周的寒冰；/它带着怒号，/匆匆地把自己整个地倾注于伟大的希望之海，/比以往更光明，更纯洁/，啊，美丽的正月，/它歌颂你带来的奇景！”

《欢悦的智慧》在德语里的原题是 *Die Frohliche Wissenschaft*，而所谓的“智慧”在德语里一般解释为科学、学问，但是尼采在这里却并不是这个意思，其意思是欢愉、华美、生命的游戏。事实上，这本书还另外有一个书名，就是《快乐的知识》，这是南法国的乡土诗人们形容他们的艺术时常用的一个称呼，尼采用：“快乐的知识”作为书名，是希望自己的作品也有一种诗人的气质，有一种如同艺术一般的浪漫自由的精神，书名中的：“智慧”（知识）毫无现代社会中科学和学问的含意。

在《欢悦的智慧》一书中，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比《曙光》更进了一步。在这本书中，尼采意味深长地说：“决心反对基督教，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动机，而是兴趣了。”他对基督

教把人定为有罪的观念深为不满，他严厉地斥责道：“基督教的创始人认为没有什么比人类的罪更能使人类罹受如此大的痛苦，其实他错了，错在他认为自己没有罪，因此他缺少这方面的经验！也就是这样，在他的心目中充满了对其子民之烦恼的极大的同情与怜悯，而发明罪的人的本身当然不会有什么大烦恼！但是基督教徒后来终于知道应该如何去表现他们的教主的正义，并将他的错误净化为真理。”同时，尼采反对基督教的那套叫人忍让、克制的道德体系，他说：“不要老是强调‘不要作这个断绝一切的念头，要克服你自己’，从某种方面来说‘凡是能鼓舞我，使我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去做某种事，除了只想一个人能独立将它完成，其余什么都不想’的道德体系我便甚为喜欢。”他认为自我克制的教训，压制了一切自然的本能与欲望，也妨碍了人的精神的自由飞翔。他在该书的第305节《自制》中写道：“那些讲道德的先生们都是先教人要将自己置于自身的掌握中，因此而使其得到一种古怪的疾病——对所有自然的本性和欲望的一种敏感。凡是会驱使他、怂恿他、引诱他或逼迫他的一切，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对这近乎自制的病态的敏感来说似乎是很危险的，他不再放任自己去相信任何直觉意识或者自由的飞翔，而改采用一种戒备的姿态挺立，与自己相抗，他怀着不信任的锐利眼光将自身之堡垒的守望者的职务指派给了自己。”由此，尼采进一步指出基督教的迷信及其道德行为的特征，只是自制、自贬、自我牺牲或同情与怜悯，而这样一种怯懦、自我贬抑及自我否定实际上是人格缺陷所显现出来的病态心理，当他谈到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对欧洲人的不良影响时，尼

采作嘲笑的口吻写道：“一个赤身露骨的人通常难以入目——我说的是我们欧洲的男人（当然绝不是指欧洲女性）。如果一桌原来高高兴兴共餐的人，突然发现到他们被某种妖怪作法而脱去衣袍，我相信不仅原来的欢乐气氛会立即荡然无存，而且纵然有再好的胃口也会倒尽——似乎我们欧洲人总能摆脱这种‘衣着’的伪装……欧洲人以道德来伪装自己，乃是因为他变成一种有病且跛足的动物，有很好的理由被驯服，因为他几乎是一种畸形、不完整、虚弱和愚蠢的东西……并非是被掠夺之动物的凶残，而是群居动物的十分平庸、忧虚与倦怠。发现道德的伪装是不可缺少的，道德扮饰了欧洲人——让我们明白这一点。”由于对基督教的反对，尼采对宗教问题的本身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宗教创始者的真正发明只是建立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模式及日常习俗，并且使人们能够接受，沉浸在其中而不知道疲倦，其实这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心灵上的幻影，是一种没有实际依据的东西。

另外，尼采在《欢悦的智慧》中谈到了疯狂的问题，这似乎是一种兆示，因为尼采后来果然疯了。不过尼采在《欢悦的智慧》中并没有认为疯狂是一种非常糟糕的事，相反他对疯狂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他说：“高贵与疯狂看来是十分接近的。因为它能够使人预见用现实的标准来衡量的那些价值。”他认为最个性化的体验是最真实的。他支持人们去摆脱正统观念的束缚，抨击一切向“传统惯例和道德”奴颜卑膝的作法，他认为只有放弃正统的人才能够升华到较高的境界。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尼采以寓言的方式，借狂人之口宣告“上帝已死”。可以说在尼采反基督教的战斗，最具有震撼

意义的，莫过于发布了“上帝已死”的宣言，所谓“上帝已死”，是说基督教最高理想的幻影在人们心中已经幻灭或应予破灭，尼采反对的上帝实质上是基督教的上帝，而尼采反对基督教是因为它的道德价值观念的颓堕。从这个意义上看，尼采否定上帝主要是从道德价值角度考虑的。正是因为基督教的道德的虚假，所以尼采宣告上帝死亡了。尼采认为人们对上帝的信仰早就应该消失，那些超自然的目的中的人生“意义”也应该消失，而真正的价值意义应该在人的世界之中。

在《欢悦的智慧》中，尼采只是初步提出了“上帝死亡”的观念，并没有像他后来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反基督》两书中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解释。但是《欢悦的智慧》确是第一次提出了震俗骇世，而且至今仍然回荡着历史重音的著名命题，这些观念是以后尼采哲学大厦的基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来看看尼采在《欢悦的智慧》中是如何来谈上帝之死的吧。在该书的第126节《疯子》里，尼采写道：

“你是否听说过，有一个疯子大清早手持提灯，跑到菜市场，不断地大喊：‘我找到了上帝！我找到了上帝！’由于四周的人不信上帝，遂引起一阵骚动，怎么搞的！他失掉了魂吗？其中一个说道。他是不是走错路了？另一个说。还是他迷失了自己？他害怕我们吗？他在梦游吗？人们议论纷纷，哄然大笑。这个疯子突然闯进人群之中，并张大双眼瞪着大家。

“‘上帝到哪里去了？’他大声喊叫，‘我老实对你们说，我们杀了他——你和我！我们都是凶手！但我们是如何犯下这件案子的呢？我们又如何能将海水吸光？是谁给我们海绵而

将地平线拭掉？当我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时又该怎么办？它现在移往何方？我们又将移往何方？要远离整个太阳系吗？难道我不是在朝前后左右各个方向赶吗？当我们通过无际的空无时不会迷失吗？难道没有宽阔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呼吸与休息吗？那么不会更冷吗？是否黑夜不会永远降临且日益黯淡？我们不必在清晨点亮提灯吗？难道我们没有听到那正在埋葬上帝的挖掘坟穴者吵嚷的声音吗？难道我们没有嗅到神的腐臭吗？——即使连上帝也会腐坏！’

“‘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害了他！我们将何以自解，最残忍的凶手？曾经是这块土地上最神圣与万能的他如今已倒卧在我们的刀下，有谁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有什么水能清洗我们自身？我们应该举办什么样的祭典和庄严的庙会呢？难道这场面不会对我们显得太过于隆重了吗？难道我们不能使自身成为上帝，就算只是感觉仿佛值得一试？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为伟大的了——而因此之故，我们的后人将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尚的历史之中！’

“说到这里，疯子静下来，举目望望四周的听众，听众也寂然无声并讶异地看着他。最后，他将提灯掷在地上，而使灯破火熄。‘我来得太早了，’他接着说，‘我来得不是时候，这件惊人的大事尚未传到人们的耳朵里，雷电需要时间，星光需要时间，大事也需要时间，即使在人们耳闻目睹之后亦然，而这件大事比星辰距离人们还要更为遥远——虽然他们已经目睹！’同一天，那个疯子还跑到各个教堂，并吟唱他的歌。而有人问他缘由时，他总是回答说：‘假如这些教堂既非上帝的陵墓，也不是纪念馆，那么，究竟是什么玩意呢？’”

尼采在这里借疯子之口喊出了自己的心声，他要告诉人们，其实上帝早已死了，只是世俗的人们茫然不知罢了。在尼采喊出“上帝已死”之前，人们在心里一直虔诚地相信着上帝，而一些形而上学家更是以上帝为价值表格上的最高理想。尼采斗胆喊出“上帝已死”，这不仅需要具备深刻的洞察力和深广的学识，而且需要有巨大的勇气和强烈的战斗精神。

除了对基督教进行批判并宣布“上帝已死”外，尼采在《欢悦的智慧》中并没有忘却对德国的不满和讨厌，除了像以前一样对德国文化进行直接痛斥之外，此时，尼采还对德国文化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他说：“由于德国人在欧洲所作之尝试的影响，整个中世纪也被吸引了，而中世纪的黑暗也意味着欧洲的酒精中毒。德国人对生命的不满，本质上乃是一种寒冷冬天的疾病。”同时，他还认为德国是个缺乏理性的民族，他在《欢悦的智慧》一书中的第348节中感叹道：“欧洲受犹太人的帮助颇大，尤其是德国人——他们很可叹地一直是一个不讲理的民族，即使在今天也是要常常‘洗头’。”除了对德国的文化进行批判外，尼采对当时德国的体制也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他在该书的第377节《无家可归的人》中，伤感地写道：“我们宁愿住在山上，远离四季，生活在过去或未来之中，以避免一旦被任命为德国现行政体的见证人时，心中的怨气无处发泄，那是一个虚有其表而不实的政体，此外，这制度为避免不旋踵而崩溃，乃植根于两种仇恨之间，不是很不必要的吗？难道它还想要在欧洲永垂不朽吗？”他并且毫不掩饰地大胆抨击当时德国正在鼓吹的国家主义和种族仇恨，他沉痛地指责道：“在我们民族的心灵和血液

中正流淌着毒素，它使我们的躯体溃烂生疮，它导致欧洲各国纷纷像逃避瘟疫似的彼此隔离和封锁。”

另外，在该书中，他借对德国文化的批判，赞扬了他青年时代的偶像叔本华。他认为，叔本华关于“存在价值”的悲观论，并不是属于德国人的，因为德国人自以为是，盲目地崇拜着上帝，他们根本没有对自己的清醒认识。他在《欢悦的智慧》的第357节《老问题：‘德国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中喊叫道：“不！今日的德国人绝不是悲观主义者，至于叔本华，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悲观论者，容我再说一遍，乃是基于一个优秀的欧洲人的身份，而不是德国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欢悦的智慧》一书中，尼采对拿破仑和凯撒的某些方面，表示了欣赏。他之所以欣赏拿破仑是因为他有统一欧洲的思想，而对凯撒的欣赏，是因为凯撒的热情，并能控制他的感情，但是尼采并不是崇拜他们在战争和政治上的成就，因为在尼采的观念中，是强烈反偶像的，对任何“英雄”崇拜的思想，是他深恶痛绝并坚决厌弃的。后来有人根据尼采对拿破仑和凯撒的某些欣赏，认为他是崇拜英雄的人，其实这是一种谬见。

也就是在《欢悦的智慧》一书中，尼采第一次给自己定了位，他认为自己天生就属于那种不能享受世俗快乐的人，在该书中，尼采把自己同浪漫主义派，和基督教徒做了对比，他认定自己是戴奥尼索士式的悲剧人物。

而且通过这本书，尼采建立了自己的独特自信，他感到自己的著作正在把人类引向一个前人没有经历过的途径之中，也正是这种自信，使尼采后期的作品更有了深刻性和概括力，并以其天才的思想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第十二章 独一无二的杰作

1882 年冬天，对尼采来说是一段并不愉快的日子。这个时期，尼采与俄国少女莎乐美的那段情感，以莎乐美写信谩骂尼采的方式结束了。深受恋情打击的尼采心境十分凄凉，他离开了巴塞尔，独自前往直意大利的热那亚，准备在那里过一个清静的冬天。正在这个时候，尼采与妹妹伊莉莎白的关系也出现了僵持状态，他对妹妹过多地干预他的生活表示了不满，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说：“亲爱的妹妹，我不喜欢像你这样的人，特别是当他们在道德问题上傲慢自大的时候。”这一年的圣诞节，尼采独自一人在意大利的拉帕洛（Rapallo）度过了，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朋友，然而正是在这最孤独凄凉的日子，尼采开始准备写作一部伟大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早在 1881 年 8 月，关于查拉图斯特拉的概念就在尼采的心中形成了。尼采曾自述说：“现在我愿意告诉你有关我的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事。他的基本概念是永恒重现的观念，为肯定的最高形式。1881 年 8 月，我急速地写在一张纸头上，并附带了一句话：‘远离人类和时间 6000 英尺。’那一天，我正在西尔乌普拉那湖边的林中漫步，在离苏莱不远的巨大高耸而尖尖的岩石旁边，我站着不动，就在这个地方，我获得了这个观念。”

从查拉图斯特拉的概念在一瞬间涌现出来以后，一直到尼采开始动手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在尼采心目中共孕育了18个月（即从1881年8月到1883年2月）。

在1882年的冬天，疾病和痛苦又开始向尼采奔袭而来的时候，尼采开始正式动手创构查拉图斯特拉了。他在自传中回忆这段情景时说：“1882年的冬天和1883年春，我住在美丽的拉帕洛小海湾，那儿离热那亚不远。我的健康情形不太好，冬天寒冷多雨，我住的小客栈是如此地靠近海水，夜里我睡觉时总是听到海涛的澎湃声音，使我无法入眠，这种情景确是很糟的，尽管如此，这好像说明了我的信念，生命中每样事情的决定都来自重重的障碍，就在这个冬天和这不愉快的环境里，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生了。”

从1883年3月份开始，尼采开始起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分，他以上一年8月份的写作提纲为基础，写得非常快，这个时候尼采感到了一种创作的快慰与安乐。他在给朋友欧佛贝克的信中说：“我感到仿佛受到了闪电的触发，眼前一片光明。”在这封信里，尼采还说他以后将不再写字了，他愿把这本书作为最后的遗言。到1881年的2月底，尼采就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分完成了，这一次他没有叫老朋友盖斯特来替他抄写稿件，他自己亲自誊写完全文，然后他把作品交给多次与他合作的出版商什玛茨奈，正在这个时候，尼采从报纸上得知瓦格纳去世了，非常震惊，他对自己的朋友兼敌人瓦格纳的永远离去感到悲伤。他在给朋友盖斯特的信中说：“与一个最敬爱的人对立6年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不得不反对的瓦格纳最终还是衰老离世了，至于

真正的瓦格纳，在某种程度上我会是他的继承人。”

在尼采沉浸在失去瓦格纳的伤痛时，他又收到了妹妹自罗马写来的信，在信中伊莉莎白向尼采道歉，请求他的谅解，尼采答应了。于是他离开拉帕洛，赶往罗马看望妹妹，但是当尼采兴冲冲赶到罗马后，却令他失望了。在那里他过了生命中一个惨淡的春天，据他后来的自述说：“这个地方（罗马）真使我烦闷，差一点没死掉，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经验。罗马这个城市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对‘查拉图斯特拉’的作者而言，这是一个最不适宜的地方，这个城市加在我精神上的压力很重，我已经想离开。我想去阿奎拉（Aquila）——这个地方与罗马完全不一样，是按照与罗马完全相反的方式建造的。”由于尼采觉得当时的罗马，不适于他的写作，他想离开罗马再换一个地方，但一时又找不到更好的地方，所以从这一年的3月到6月，尼采还是呆在了罗马。尼采努力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专心地进行创作。在朋友的帮助下，尼采在罗马发现了一个清静的场所，在一个能够俯瞰整个罗马的广场的上端，有一个乘凉用的廊台，在这个凉廊的下边有一个泉潭，泉水声不绝于耳，泉水如泣如诉的声响使尼采感伤不已，同时也使尼采的灵感奔涌不已，在这样的环境里，尼采的思想得到了梳理，为他继续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打下了基础。

1883年6月，尼采终于离开了罗马，来到了小国瑞士。很快他就发现瑞士的高山上的空气很适合他，于是他的创作力又恢复了。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尼采说：“这夏天，发现我自己又在一个神圣的地方了，在这里，查拉图斯特拉

的最终思想又像闪电一样在我的心头出现，我想出了查拉图斯特拉的第二部分，只消 10 天功夫就够了。”这个时候，尼采重新被思想的灵感所振奋，他关于查拉图斯特拉的思想如洪水般在他胸中起伏，他奋笔疾书，有时甚至工作到午夜。6 月还没有过完，尼采就写完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二部分。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分后，尼采就离开了罗马，到了瑞士西尔斯·玛丽亚镇，这是一个环境十分优雅宁静的地方，尼采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里。在此后的 5 年中，尼采每年夏天都来到这里，让自己的身心得到疗养。这一年的秋天，尼采因想念家乡瑙姆堡，又离开了西尔斯·玛丽亚镇。尼采回到家乡后，好友欧佛贝克夫妇立即来拜访他，这使尼采十分欣慰，他一颗颠沛流离的心暂时得到了抚慰，心情也好起来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尼采听说他的妹妹伊莉莎白正在追随一个一贯强烈反犹太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波哈·佛斯特，她的妹妹不仅帮助这个人收集 25 万人的签名的反犹太请愿书，而且还准备与他结婚，这使尼采非常恼火，因为尼采本人是不主张反犹太的，相反，他对犹太这个民族还充满了尊敬，这样，他与妹妹又一次闹翻了。他的情绪也变得反复无常起来，为了使自己的心情变得好一些，尼采离开了故乡瑙姆堡，他取道法兰克福来到了巴塞尔，在巴塞尔这个久别了的城市逗留了几天后，尼采又马不停蹄地去了意大利的热那亚。这一年的冬天，尼采又辗转到了法国南部的尼斯，他在那里愉快地过完了那年的圣诞节。

尼斯是个美丽的地方，特别是在冬天时，气候温暖宜人。这一切又激发起了尼采停止了数月的创作激情，他后来在自

传中回忆说：“冬天，在尼斯平静而晴朗的天空下，我第一次享受了光辉的阳光，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第三个查拉图斯特拉……在尼斯四周乡间的许多偏僻地区 and 山岗，由于那些不可忘怀的时刻，使我觉得一切都很奇妙，我的创造力无拘无束地涌出来，我的肌肉活动也变得很强……人们总是看到我在雀跃着，我经常在小山之间步行七八个小时而丝毫不感到倦怠。我睡得很好，而且常常带着笑容——我完全是生气勃勃而坚忍的。”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尼采开始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分的创作。这时候，尼采真可谓是激情澎湃。他给老朋友欧佛贝克去信时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迸发出了我几十年来所积聚的力量。”同时，他的自信心也进一步增强了，他在给朋友洛德的信中说：“我自诩，通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我已经把德国语言带到了她的最高境界。德国文学在路德与歌德之后，必须迈出第三大步了。亲爱的朋友请告诉我，以前是否曾有过集力量、活力与音韵之美于一体的这样的佳作。读了一页我的书后，再去读歌德的作品，就会看到我的文章更为粗犷雄浑而同时又不像路德的作品那样过于粗糙。”在这个时候，尼采对自己将来的哲学任务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他认为完成这个任务需要 6 年的时间。

1884 年的 7 月，尼采重新回到西尔斯·玛丽亚，在这里安顿好之后他开始把在法国尼斯时各种灵感进行整理归纳，并着手正式撰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二部分。不幸的是，尼采这个时候的身体状况比以前更差了，他的眼疾进一步恶化，看东西和写作时，眼睛感到很吃力，而且他的背

部越来越弯曲，再也难得挺直了，他怀疑这些都是精神病早期症状。

不过，在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分时，尼采也有一件值得欣慰的事。1884年8月末，尼采在西尔斯·玛丽亚镇接受了一个青年瓦格纳的拥戴者亨利克·冯·施坦恩的来访，他与施坦恩连续几天进行长谈，使他长期以来的抑郁心情得到了缓解，又开始感到兴奋起来，他称施坦恩的这次来访是那个夏季最大的收获之一，并且他决心在自己的周围汇聚更多有奇才的青年。

到1884年8月初，尼采终于顺利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三部分，与该书的第二部分一样，尼采的这一部分，也是一气呵成的，而且用的时间很短，不到20天。

创作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三部分后，尼采的妹妹伊莉莎白准备与夫婿波哈·佛斯特一同去南美洲。尼采的母亲几次写信来，要尼采赶到苏黎世去为他的妹妹送行，但是尼采不愿意。他给朋友写信说：“同她这样一个充满报复心的反犹太的人，现在谈不上和解的问题。”但是，尼采的母亲最后几乎是请求他，要他无论如何去送送远离故乡的妹妹，为了不伤母亲的心，尼采只好去了苏黎世。在那里，他送走了妹妹和妹夫，然后他呆在了苏黎世，并开始动笔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四部分，在写作这一部分的时候，尼采因为他的出版人什玛茨奈的反犹太倾向而与之关系发生了紧张，什玛茨奈不愿再与尼采合作，他出价两万马克向别的出版商转卖尼采著作的印发权，但没有人接受，他的这一行为使尼采极为伤感，尼采感到了自己在世上越来越孤独，能

接受他的人越来越少了。他在给母亲写信时说：“事实上，世上没有什么人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了，我所热爱的那些人们早都已过世了。”尽管尼采一个人默默地单调地生活着，但是他并没有被孤独击倒，相反，他带着奋进精神拼命创作。他笔下的人物查拉图斯特拉给了他莫大的鼓舞，他把查拉图斯特拉作为心灵的知音，顽强地与孤独作战。这一时期，他以为孤寂并不是一件绝对的坏事，他写道：“静居独处于一个人各方面的发展都是有益的，甚至对一个人的精神扩展也大有益处。”1884年冬天，尼采的眼病又严重了，但是尼采仍然忍受着寒冷的气候和眼病的痛苦，顽强地进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第四部分的写作。经过3个月的不懈努力，到1885年2月，尼采终于在法国尼斯完成了该书的第四部分。

尼采写完第四部分后，给朋友戈斯多夫写信，请求他帮助印制40册。但是戈斯多夫许久都没有回音，于是尼采只好自费印制了40册，书印出来以后，尼采给友人赠送了7本，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只有一个人告诉尼采收到了赠阅本，其他人都没有回音。另外，已经售出的30多本书，也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反应，没有人赞扬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相反，有人因此书而埋怨他。他新结识的朋友亨利克·冯·斯坦恩也不满尼采的这部著作，后来尼采在《我为什么写出如此优秀的书》一书中对此事作了说明，他说：“斯坦恩博士公开埋怨我，他说他根本不了解查拉图斯特拉的一句话。我对他说，这是当然的事，只要了解这本书的六个句子，就可以出类拔萃了，其高扬之处，远非一般的‘现代人’所能达到。有了这种距离之感，我怎能希望这般‘现代人’来读我

的书呢？”这真是曲高和寡。《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最为满意的一部书，也是他著作中最有力度的一部书。但是尼采所满意的，世人并不满意。一直到尼采发疯前夕，这部书一直未能得到世人的注重，这是孤独的尼采生活中的一大不幸。

从尼采的遗稿片断中，后来有人看出他有继续撰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意图，似乎由于身体的原因，他的计划未能得到实现。同时，尼采在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还产生过一个想法，即用散文性、理论性的方式来解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根本性问题，他在备忘录中曾说：“我下定决心，由我说出，而不是由查拉图斯特拉说出。”他希望通过查拉图斯特拉的说明，让人不误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意图，但同样不幸的是，由于他神经过早失常，这项计划也未能实现。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全部哲学史上，一部有独特意义的作品，它不仅是尼采的代表作，而且也是充满了文采和明亮色彩的光辉的哲学诗篇。在这本书里，尼采用华美的警句和生动的比喻表露了深沉的哲理，该书没有愚昧的祝词，没有呆板的论说，也没有使人窒息的教条。当人们读到这本书时，会被尼采灿烂的辩才和变幻无穷的文体所吸引，会感到有一股不可抗拒的提升力量贯注到了血脉中，使人觉得活力倍增，人不由得无比兴奋。尽管这部书出版后，尼采没有亲眼见到人们对它的赞誉，但是天才的尼采似乎预感到这部书迟早会被世人发现，他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曾对此书评价道：“在我的著作中，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占了一个特殊的地位。我以这著作给人类以空前伟大的赠礼。这本书，声音响彻千古，它不仅是世界上最高迈的书，山顶雄风最真实的书——整个现象以及人类都远在它的下面——而且也是最深遂的书，从最丰富的真理中产生；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这部著作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诗人们诚不足挂齿，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从如此充沛的力量中产生出来，对于‘戴欧尼索士’的概念在这里成为一种最高的行为，和他比起来，所有其他人类的行为都成为可怜而受限制的。即连歌德或莎士比亚，也不能在这种热情与提升的强烈空气中作一瞬间的呼吸；和查拉图斯特拉比较，但丁只不过是一个信仰者，而不是一个最先创造真理的人；伏陀诗人都是祭祀师，就是替查拉图斯特拉解草鞋也不配——这些全是无关紧要的。把所有伟大灵魂的精华联合起来，也创造不出一段查拉图斯特拉的谈话来。他的上升和下降的阶梯是无限的长……在他面前，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高度或深度；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真理。在查拉图斯特拉面前，没有智慧，没有心灵的省察，也没有语言的艺术，文句热情洋溢，辩才化为音乐……看！查拉图斯特拉怎样下山去！他如何向大家说话！看！他对他的敌对者——教士们是如何地亲切！在这儿，每一瞬间，人都是被超越的，‘超人’的观念成为最大的真实——任何曾经被认为伟大的东西，都远在他的下面，不可测量的距离。”

斯宾诺莎曾说过：“我不知道我的哲学是不是最好的，但我知道那是真实的。”如果问尼采，他一定会说：“我知道我的哲学是最真实的，而且也是最好的。”了解《查拉图斯特拉

如是说》的人，便会觉得尼采实在狂得可爱，他的自夸，并不过分。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借一个理想中的人——查拉图斯特拉——来宣说他自己的思想，所以查拉图斯特拉可以说是尼采的化身，是他自身的代言人。这部书全是用散文诗写成的，其语言运用之妙，确实达到了巅峰的境界。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究竟说了些什么话。

在该书的前言，是一篇结构极为完美的寓言：30岁的查拉图斯特拉刚一出现，便离开家乡，隐逸山林，在山林中他生活了很久，有一天大清早起来，他忽然心血来潮，对太阳说：“伟大的星球，如果没有你所照耀的人们，你的快乐何在呢？”

在这里，查拉图斯特拉以太阳自喻，他希望自己的理想能够贯注于世，所以他说了这一些话，便径自下山去了。在山底下他遇见了一位虔诚的圣者，交谈一番之后，查拉图斯特拉于是马上宣布上帝死亡了，并向世人宣称超人的诞生。这时，聚集在市场上的人群却不理会查拉图斯特拉，而围观马戏团的走索人表演，在这里尼采以喧嚣的市场比喻嘈杂的人生，而以走绳象征着人生的过程。当走索人一时失神摔了下来，市场上的人群便如暴风雨中的海水，四处闪避，只有查拉图斯特拉站在那人旁边。书中这样写道：“垂死者迟疑地望着他。终于说：‘……我岂不像个动物一般——受鞭策与薄酬而被教以舞蹈。’‘不！’查拉图斯特拉说：‘以危险为职业，这并没有什么可蔑视的。现在你因职业而丧身，因此我将亲手

来埋葬你。’于是查拉图斯特拉背负着死者离开了这城市，夜宿于森林之中。第二天清晨，他忽然醒悟过来，便暗自说：‘一线光启示了我：我需要伴侣——是活的，不是死人和僵尸。僵尸可由我随意搬运。我需要的同伴，他随同我，因为他们跟随自己。’由是，查拉图斯特拉开始寻找他的‘共同的创造者’。”

前言之后，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全部都是由精短的警句组成。第二部分的第一篇“精神三变”是尼采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精神三变”，是指有关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最后是狮子如何变成了孩童。在尼采的笔下，负荷很重的“骆驼”，意味着义务和禁欲，它向值得尊敬的人服从。但是当它走进沙漠后，骆驼就变成了“狮子”，狮子夺得自由，克服孤独，想自己做主人，它有了自由精神，可是，狮子为了以后的创造，仅仅能确保自己的自由，它无力创造各种新的价值，所以它虽然获得了自由，但还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尼采在下一个阶段里说：“我的兄弟们，连狮子都不能做到的事情，却能由孩童之身完成它……孩童是纯真的，是容易忘却的。”讲完了“精神三变”以后，尼采又开始对世俗的贪欲，众人的愚昧，宗教的虚伪和政治的丑恶等等现象进行了抨击和嘲笑。他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发出了雄狮般的怒吼：“我教他们推倒那古老的讲坛以及老朽的座位；我教他们嘲笑他们的道德大师、圣人、诗人以及救世者。我教他们嘲笑那阴郁的智者和呆坐在‘生命之树’的吓鸟者。我坐在他们的墓上，站在尸骸与兀鹰之旁——我笑他们一切已成的过去及其腐朽颓废的光荣。兄弟

们啊！难道我很残忍吗？但我说：凡是堕落的，都应该推倒！今天的一切——堕落了，颓败了，有谁愿意保护它！但我——我还要推倒它。”

在这里，尼采似乎想把自古以来被人视为最完美而最神圣的上帝从天国的宝座上推下来，他说：“如果有神，我怎能甘于不是神呢？因此没有神。上帝是一种预测，但我希望你的预测不超出你创造的意志。”

尼采认为，如果说神创造了一切，那么人类岂不都变成了只靠施舍的懒虫！就像那些教士，成天无所事事地跪拜祈祷。所以尼采这样写道：“最近我还看到他们早上迈着勇猛的脚步跑出，但他们的知识之脚步疲倦了，于是都诅咒晨间的勇猛。诚然他们之中也有许多人像舞蹈者那样举起步，我的智慧的笑便向他们眨眼——于是他们自己沉思着。刚刚我又看到他们卑伏地爬向十字架。”按照尼采的观念，我们既然是个人，便要活得像个人的样子，何必学着四肢落地的动物般地卑伏着呢？人们应该站起来！“离开奴隶的幸福”！书中的查拉图斯特拉像雷鸣似地呵喝，把沉睡中陈旧的道德惊醒了，查拉图斯特拉向世俗的道德开始了大胆挑战。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道德者》一篇中，尼采对于道学者施以了猛烈的攻击：“你们这些道学者！我的美今天笑你们，美的声音向我如是说：‘他们还需要报酬呢！’你们还要报酬！你们这些道学者！为道德而求酬报，为大地而求天国，为你们的今天而求永久的酬报？呀！那是我的悲哀：他们在事物的根基上暗暗灌输了赏和罚——如今甚至于灌输到你们的心灵内，你们这些道学者！但是我的话如同野猪的嘴，掀开你们

心灵的根基，你们将称我为犁头。你们内心的一切隐秘将带到光亮处；当你暴露在阳光下，掀开来，撕破来，那么真理也将和你们的谎言分家。有些人以他们的罪恶渐渐衰退而宣称为美德，当他们的憎恨与嫉妒松弛了手足，他们的正义活动起来，揉揉睡眠。另有些人被拖下去；他们的邪恶拖着他们。但他们愈往下沉，他们的眼睛便愈殷切地期求他们的上帝。还有些人沉重且辗转而来，如同满载石子的卡车下山坡，他们谈论着许多道德和神圣——他们称他们的制动机为美德……有种人骄傲于他们少许的正义，为这少许的正义而施暴于万物；因而世界陷溺于他们的无道之中……还有一种人，他们坐在自己的泥沼里，从芦苇中传出话：‘道德——道德仍坐在泥沼中。’当有些人好作姿态，便以为道德是某种姿态。他们的膝常膜拜，他们的手常是道德的赞颂，他们的心中却什么也不知道。还有些人，认为这样说便是美德：‘道德是必要的，’但最后他们只相信警察才是必要的。他们在海滨游玩，一个浪卷来，将他们的玩具卷到深处：他们便哭泣，但相同的浪将带来新的玩具，而留下新的彩色的贝壳给他们。”

在尼采笔下，查拉图斯特拉的所有思想，如一阵狂浪，卷走了过去的陈腐卑驯道德，而留下了“新的彩色的贝壳”——新的道德。

在该书中，尼采进一步打破了神这个偶像，而肯定了人和人类的痛苦，他说：“人是最勇猛的动物，因此他超过了任何禽兽，人的凯旋的奏乐克服了任何痛苦；人类的痛苦却是最深沉的痛苦。勇猛的同时也击破了面临悬崖边缘的晕眩：人生何处不置身于悬崖的边缘呢！勇猛是最好的击杀者，也击

破了怜悯。勇猛是最好的击杀者：勇猛攻击着，甚至于将‘死亡’本身也击杀了，因为它说：‘这就是生命吗？好，再来一次！’在这些语言中，便有凯旋的奏乐，有耳朵的人，请听着吧！”

尼采认为，人应该是个勇猛的动物，具有道德勇气的动物。然而“现代人”却在受了虚妄的宗教文化与奴性的道德观念的濡染，而渐渐成为了柔弱的种性。尼采相信：“凡是柔弱的种性，凡是生于奴隶的种性，如今都成为一切人类命运的主人了！”

这些人类命运的主人，在尼采眼中都是“市场上的苍蝇”，在神圣的表皮下藏着可鄙的内容，他说：“市场上满是吱吱喳喳的小丑——群众称颂他们为伟大的人！这些人便成为时代的主人。时代压迫着他们，于是他便转而压迫着你。他们希望你唯唯诺诺，哎呀！你将在顺与逆之间放置你的座椅？”

这些时代的主人，只知享受着“可怜的安逸”，这些人在尼采敏锐的眼光透视下，都是畸形的人物。他用一则故事比喻说：“有一天，查拉图斯特拉走过大桥，一群跛子和乞丐围着他，一个跛子向他这样说，‘……你可以使盲者复明，跛子奔跑；这是使跛子相信查拉图斯特拉最好的办法！’查拉图斯特拉回答说：‘当一个人取去驼子的驼背，那末也取了他的灵魂——人们这么说的。当一个人使盲者复明，那么他会看到地球上太多的坏事情：如果使跛子跑步，那对他是最大的损害；因为他的罪恶会和他一起奔跑。——关于跛子，人们这么说的。’……然而，这是我从群众中所看到的最小的事情，这人缺只眼，那人少只耳，另一人又断条腿。我看见过更糟的事，

许多人一无所有——这些人，不外是一只大眼睛，或一张大嘴巴，或一个大肚子，我称这些人为颠倒的残废者。人们告诉我，这大耳朵不仅是个人，而且还是个伟大的人！是个天才呢！”

尼采之所以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评讥“现代人”以及那些泡沫般的“时代主人”，是因为深感于他们受一种堕落的文化价值所熏染。而这些堕落的文化价值，尤以世俗道德与虚妄的宗教为主，在此又形成了尼采反基督教与世俗道德的观点，正如他所说的：“有谁必须在善与恶中成为创造者，诚然，他必先成为毁灭者，破坏价值。由是，至恶亦属于至善，但这是创造的善。让一切东西破碎吧，还有许多屋子得盖起来。”

尼采以锋利的文笔向那些颓废的文化价值挑战，而后在废墟中重新竖立起一套新的价值观念——以坚强者的道德代替了懦弱者的道德，以创造的超人代替了空幻的上帝。尼采大胆创立了超人这个新概念，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中，尼采用了很大的篇幅、显著的地位阐发了他的“超人”学说，他把“超人”看成是最健全的、最完整的人，认为超人是他的理想世界的建设者，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生活最有价值的产品。他说：“人是要被超越的一种东西。自来的一切生物都创造某种东西超越了自己。”“人之所以伟大，乃是他是一座桥梁，而不是目标。”“人之所以可爱，乃是他是一种过渡和一种毁灭。”“我爱他们是渴望达到彼岸的箭，我爱他们不在世界之外去追求牺牲的理由，我爱他们为使大地成为超人的地而牺牲，我爱他们为

求知超人而生活着、工作着、发明创造着。”

在表达了超人思想的同时，尼采还建立了万物轮回的思想，可以说“万物轮回”是尼采所有理想赖以实现的精神支柱。他认定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要不差毫厘的重演，要人深信现实存在的一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一切都将毁灭，毁灭以后又会再生。“万物出来，万物出去，存在之轮，永远运行”。“现在身死而消灭，在一刹那间化为乌有，灵魂和肉体一同腐朽。但是，我所缠绕的因果之纽带循环着，它将再把我创造。我还会回来向人类宣讲超人。”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最优秀的作品，同时查拉图斯特拉这个人物的性格也是非常独特、复杂的，实际上在查拉图斯特拉身上寄托着尼采的理想和幻想，了解了查拉图斯特拉的性格，也会增加对尼采的了解。尼采本人曾对于查拉图斯特拉的性格作过这样的描述：“为了了解查拉图斯特拉的性格，你必先要很清楚地了解他的强健的生理条件，一种我称为‘伟大的健康’的条件。凡是灵魂希求体验以前的价值，并想在这一理想的地中海作一次远航，他们将从自己的深奥之经验探索中，得知做一个理想的征服者与发现者是什么样的滋味——这样的人，先决地需要一件东西，就是‘伟大的健康’——不仅只是静态的健康，而是不断地获取与必须获取。因为他要不断地耗费他的健康，并且必须耗费它！因此，现在我们理想的探索者们，我们既已在这路上走了这么远，我们的勇气比我们的谨慎更大，而且常常更易受损伤，但我说，比平常人所能承认的更大的健康，不断地康复。”

在这里可以看出，查拉图斯特拉有着如此“伟大的健

康”而且非常勇敢，尼采写下这个人物，就是要鼓舞我们培养我们一种奋勇的精神，以展拓狂澜的生命，开拓新生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中，每个人将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再做上帝的奴隶，因为上帝已经死了。

第十三章 最后的光芒

1885年5月，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后，尼采的健康状况开始明显恶化，他感到自己的头越来越痛，干什么事总是受到头痛的干扰。身受病痛折磨的尼采，一方面认为这些疾病大多是由于生活环境所致；另一方面他怀疑自己因遗传患染了梅毒病，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恐怕没有哪个贵族之家不存在性病和没有出现血统退化的，堕落腐化最严重的莫过于德国贵族了。居家酗酒，出门则带回梅毒病，到目前为止，贵族们对于学识问题简直是门外汉。”这时候，尼采似乎对于自己出身于贵族家庭表示了不满。正当尼采闷闷不乐的时候，他听说妹妹伊莉莎白准备与波哈·佛斯特结婚，本来尼采就不同意这门婚事，可更叫尼采难以接受的是，他妹妹竟把婚礼安排在瓦格纳的生日里举行，并说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对瓦格纳的尊敬的热爱，尼采对妹妹的这种行爲感到极为不快。尽管母亲反复邀请，但是尼采还是不愿去参加妹妹的婚礼。那一天，尼采独自一人去了威尼斯，在那儿呆了一个月后，他又来到了瑞士的西尔斯·玛丽亚镇，他准备在那里度过第5个夏天。西尔斯·玛丽亚镇的宜人气候，使尼采的忧虑心情略有好转，他开始为《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再版而进行改写工作，同时，他还开始了《善与恶的超越》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写了不到一个月，尼采就开始思念

起远在故乡瑙姆堡的母亲，于是他赶回到家乡，在家呆了半个月后，尼采又开始思念外面的世界，于是他又开始了流离颠沛的生活。这年秋天，他先后辗转于莱比锡、瑙姆堡和慕尼黑，最后转道去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这种流浪的生活，使尼采渐生厌倦之情。当冬天来到的时候，尼采又想到了法国的尼斯，他愿意再回到那个他多次过冬的美丽地方。来到尼斯后，尼采才觉得几个月来颠簸流浪的日子应该结束，自己应该安定下来了。于是，他开始继续写作《善与恶的超越》一书。关于这本书，尼采在自传《瞧！这个人》中说：“我一生事业中肯定部分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要轮到否定部分的工作，对以往的一切价值进行重估……从所有重要的各方面来说，这本书（1886年）的核心是‘现代之批判’，包括对现代科学、现代艺术甚至现代政治的批评，同时也指出与现代人相反的形态，这种相反形态的人将尽可能地与现代人不同，将是一种高贵而积极形态的人。以后从一定意义来说，本书是供作上等人的读物。”在该书中，尼采驳斥了现代文明的堕落，并且认为基督教理想实为种族的产物。在这本书的最后，尼采又论述了自主道德和奴隶道德的区别，他提出了一种特异的道德观念，整个颠倒了传统的善恶观念，他“以恶为善，反善为恶”，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督教道德提出了挑战，要以此新道德把人类从堕落的深渊救助出来，向“超人”跃进。

1886年6月，尼采终于完成了《善与恶的超越》一书，但是尼采的出版人什玛茨奈却不打算出版《善与恶的超越》，同时，他又不愿意让别的出版人来发表它。尼采于是决定自费出版此书。在给朋友欧佛贝克的信中，他说：“假如这本书能

售出 300 册，我就可以挣回工本费，用这样的办法也可以出版我的别的书了。”为出版此书，尼采花了不少精力。最后，在另外一位出版商弗利茨的帮助下，《善与恶的超越》终于出版了，但接受的读者并不多，就连尼采昔日的朋友罗德也说：“这本书所写的哲学部分毫无力量，简直是儿戏。关于政治方面，也是一派胡言，完全不了解社会，不过是模仿别人，而作拼凑工作而已。并且在贝隆的杂志上给尼采予以严厉批评。尽管如此，还是有少数人对《善与恶的超越》表示了理解，比如当时法国大作家伊保利特·德奴就对尼采给他的赠书，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了对该书的理解。另外，一位名叫惠特曼（T·V·Widmann）的学者在报上也发表文章说：“尼采是一个发现了一条循径的人，但是当人们看到尼采独自在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孤独的道路上挺进的情形时，是不会不感到担心与害怕的。”听到这些赞誉，尼采颇感欣慰，他在给朋友玛尔维达的信中充满自信地说：“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到 2000 年时人们将会获准来读我的这本书的。”

写完《善与恶的超越》一书后，尼采又从西尔斯·玛丽亚镇返回到法国的尼斯。这时候，远在巴拉圭的妹妹伊丽莎白几次来信催促尼采向南美洲殖民地投资，尼采一度曾动过心，但是在好朋友欧佛贝克的劝阻下，尼采终于决定拒绝妹妹的要求，为此引起了伊莉莎白对欧佛贝克的不满。同时，妹妹对哥哥尼采听信旁人的话也非常失望。

1887 年，尼采在尼斯找到了一间朝南向阳的小房子，这是他自 1870 年以来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和法国的尼斯过冬住过的第 21 个住所，尼采非常满意这房子，他愉快地搬了进去。

在这里，他得以享受冬季阳光的温暖，但是由于他像以往一样因为经济困难而不能买炭在室内生火取暖，所以他的手指常常冻得发僵，然而尼采仍然冒着严寒不停地写作，只有在写作中，尼采才感到生命的意义和欢悦。他给朋友盖斯特去信说：“我从最冷峻的理性批判中，享受到了无穷乐趣，并恢复了我的力量，这样我就来抨击迄今为止哲学中的僵化的思想，还有一些更为糟糕的东西。”

在这段冷寂而充实的日子里，尼采有幸发现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年2月，尼采在尼斯的一家书店里，偶然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的法文译本，尼采立即被他新鲜而富有生气的思想深深地吸引住了，接着他又到处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著作。最后，他又发现了这位作家的《死屋》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读完这两本书后，尼采激动不已，他高度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是有史以来最富有人性的著作之一。尼采在给老朋友欧佛贝克的信中说，尽管他发现陀思妥夫斯基已太晚了，但他还是十分高兴，他庆幸自己在有生之年终于发现了这位作家，他甚至认为陀思妥夫斯基是唯一对他有启发的心理学家。

在尼斯住了4个月后，天气渐渐转暖了。于是尼采离开了尼斯，来到了坎诺比欧。这里风光美丽，使尼采流连忘返。但是，尼采还是不能真正从内心高兴起来，看到那些成群结伴游玩的夫妻们，尼采总是感到莫名的伤感。他给老朋友欧佛贝克去信时羡慕地说：“由于你的妻子，你的生活比我的现状要强100倍，你到底是有了一个窝，而我有的仅是一个山洞。”再加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发表后，许多朋友与

他疏远了，而《善与恶的超越》一书出版后，也只仅仅卖出了114本，这更加深了尼采的孤独。他感到了深深的压抑，觉得自己生活在一片凄冷的黑暗中，没有人能够真正地鼓舞他、理解他。在坎诺比欧呆了一个月后，尼采又不愿在这个地方忍受孤寂的折磨了，于是他转道德国的慕尼黑，又返回到了久违的西尔斯·玛丽亚镇。在这里他开始创作《善与恶的超越》一书的续篇——《道德的谱系》，尼采在写作这部著作时，主要使用的是以前陆续作的一些笔记，所以写起来很快，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尼采就写完了全书，而且交给出版商付印了。

写作《道德的谱系》时，尼采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了些，创作使他感到快慰，他高兴地给母亲写信说：“我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之中，看来我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力量又得到了恢复，由于对每日的起居做了改进调整，工作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同时，他给老朋友盖斯特去信说：“《道德的谱系》一书是为我以前的著作能被人理解所做的最后努力，也许今后几年不再有什么问世了，我必须实行绝对的自我精力集中，一直等到我有能力把最后一颗果实从自我的大树上震落下来。”在《道德的谱系序》中，尼采进一步阐述了《善与恶的超越》一书中的观点，并对那些不理解《善与恶的超越》一书而对它进行攻击的人予以了反驳，尼采依靠自己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对德语进行了全面考察，他从中发现“善”与“恶”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德语中，“恶”这个概念因社会地位不同而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而且也用了不同的字，上流社会说“恶”，意思是平凡、庸碌、粗俗、下劣；

下流社会会说“恶”，意思则是不熟悉，不规划、难予猜测、危险、伤害、残酷。“恶”是这样，“善”也相似，“善”在德语中虽然都同是用一个单词来表示，但在贵族中，“善”是指：强壮、勇敢、权力、奋斗，在平民中说的“善”则是指：熟悉、和平、无害、好意。

尼采根据这个事实认为，既然道德观念在事实上是因人而异的，现在的问题是区别那一种道德观念对人真有好处而把它称为善事让大家追求，那些道德观念只在表面上对人有好处，实际危害于人应定它为恶的，教人鄙弃它，在它的危害中解脱出来。由于生存就是斗争，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所以，只有那些使人优胜、强健的思想和行为能称为“善”，那些只能使人衰弱、败亡的思想与品性，不管世人怎么看，都应该把它们称为恶。“推崇男性、刚强、冒险、勇猛”是善，“卑逊、利他”是恶。爱战斗、爱创造、积极进取有利于生命强大的是“英雄的道德”，爱安稳、爱和平、与世无争、不求进取、乐天知命、自我牺牲，这些不利于生命强大的是“奴隶的道德”。兴英雄之道灭奴隶之性，人才能得以健全。

在该书中，尼采指斥基督教是奴隶道德的传播者，民主主义、功利主义、社会主义，人人平等这些思想都是在奴隶道德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些思想的提出并不是人类的进步，而是一种倒退。这些思想使社会染上一种致人于衰弱的疾病，瘫痪下来。狡猾代替了讎仇，怜悯代替了严厉，模仿代替了独创，良心代替了自尊。人类就从此堕落了。

《道德的谱系》在结构上十分严谨，共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既互相独立，又互相联系着，在尼采后来写的自传

《瞧！这个人》中，他对该书作了非常全面的解释：“在每篇论文中，开始的时候，都是故意地把人导入迷途；它是冷漠的、科学的，甚至反常的，故意惹人注意的，故意缄默的。渐渐地，气氛变得比较不平静；偶然间，有一道闪电；从遥远地方发出来单调的隆隆之声，唤起对那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事实之注意——直到最后，遇到一个强烈的行进速度，于此，一切东西都是热烈地奋力向前。最后，在每一情形下，在可怕的霹雳声中，透过浓浓的乌云，又可以看见一个新的事实（truth）。原来是来自于憎恨心理，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是产生于“灵”（spirit）——它主要是一种反抗运动，反抗受高贵价值的支配。第二篇论文是讨论良心的心理性质：所谓良心，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乃‘人心的上帝之声’；它是一种残忍本能，当这种残忍本能不能再向外发泄时，便反过来对自己发泄。在这里，残忍第一次地表现为文化基础中一种最古老最不可缺少的因素。第三篇论文是对苦行主义者的理想、教士的理想的动力来源问题，提出答案。”

《道德的谱系》于1887年的冬天正式出版，那时候，尼采正在法国尼斯过冬天，由于他住的小屋里没有火炉，阴冷的天气使他无比痛苦，他向朋友盖斯特诉苦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冷得发抖，手指冻得发僵，这对我从事哲学论著太不利了。从外面回到家里一点也不像是回到宫殿那般温暖，相反却像是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牢房。”尽管尼采居住的环境使他的心情受到了影响，但是朋友们对《道德的谱系》的赞扬又使尼采感到宽慰。朋友戈斯多夫来信对该书评价说：“你生活在一个美丽、自由的世界里，我祝愿你永远是位哲学家。”

尼采在回信中动情地写到：“在我一生中，很少有信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欢乐。”另外，丹麦著名的批评家乔治·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在收到尼采赠送的《道德的谱系》之后，给尼采来信说：“一年以前，我从您的书商那里收到了您的著作《善与恶的起越》；前些天，您的新作又以同样的方式到达我的手边。在这里，我无论如何应该立即表达一下我的真诚的谢意，感谢您为我寄来了新作。我觉得，能够认识您，并且是以这样的方式认识您，即您希望我成为您的一个读者，这对我是一种荣誉……一种新的、创造性的精神从您的书中向我吹拂。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您书中的一切，还不能时刻把握住您的意图，但是，我发现了许多与我的观点和同情极一致的思想。”

这是尼采和勃兰兑斯的第一次通信，也是第一次正式交往，从此以后，他们互相往来，互相激励，成为了一对虽相隔万里，却心心相通的好朋友。收到勃兰兑斯的第一封信后，尼采十分兴奋，他在回信中写道：“我亲爱的先生，只为少数读者带来荣誉，除他们以外，根本不要读者——这的确是我期待的。然而，关于这个愿望的后一部分，我不得不说，实现它的希望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现在，我越来越为一小批人而高兴了，我由衷高兴地看到，您——一个如此优秀的欧洲人，文化的传教士也将成为他们一小批人当中的一员；我感谢您的真诚的情谊。您的‘贵族激进主义’一词用得太好了，请允许我说，在我看到的有关我本人的各种术语中，它可以算是最聪明的一个。”

写完《道德的谱系》一书后，尼采又开始计划写一本

《一切价值的重估》，他想以这本书对以前未表达的思想再作一点补充。尼采给勃兰克斯写信，解释了自己要对过去一切价值进行重新估价的意图，他说：“只有炼金术士才真正丰富了人类的财富，其余的人则都在进行买卖和交换。现在，我的工作十分奇特：我曾问过自己，人类最痛恨、最害怕和最讨厌的是什么？可是正是从这些东西里面，我已经炼出了我自己的‘黄金’。”

这个时期，尼采认为自己的哲学体系已完全建立起来了，他自信自己的思想必将在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给朋友莱茵哈特夫妇的信中，他对自己作了如下评价：“我有一句话只能在咱们三个人中说，那就是人们将会理解我是这个时代最主要的哲学家，甚至可能还不至于此，我也许就是负着重大使命的一座沟通两千年历史的桥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尼采觉得一种比以前更为严重的孤独正向他席卷而来，使他的心灵充满了哀愁，唯一带给他安慰的是音乐。他给朋友写信时充满了对音乐的感激，他动情地说：“音乐带给我前所未有的经验，它将我从自身中释放出来，使我从迷茫中觉醒……音乐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在有音乐的夜晚，接踵而来的就是充满坚实洞察力和创造性思想的清晨……没有音乐的日子是迷惘而沉闷的，像被放逐一样，如果在这世上没有音乐，那将是多么枯燥乏味。”幼年时就培养起来的音乐爱好帮助了处在困难时期的尼采，让他在阴郁的生活中找到了精神安慰和寄托，增添了他生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1888年5月，尼采开始对青年时代的朋友瓦格纳进行反思，为此他撰写了一篇《瓦格纳事件》。该文中，尼采把瓦格

纳描写为现代主义与颓废的主要代表，他说：“如果一个人对这部论文作公平的评论，就当从音乐的命运中去感受巨大创伤的痛苦。我所感受到的音乐命运的痛苦是什么呢？那就是音乐已失去了它的改造世界及肯定的性格，而沦为颓废的音乐，不再是戴奥尼索士的笛声了。如果一个人认识到音乐产生的原因就是他自己存在的原因，就是他自己苦痛感受的流露，那么他就会觉得我这部论文是非常平和的。谁能怀疑我这老炮兵向瓦格纳发射我的重炮呢？”

写完《瓦格纳事件》后，尼采的身体开始全面恶化，他不仅经常头痛，而且呕吐不止。1888年的夏天，尼采感到自己的身体已因写作而被完全拖垮了。他在给母亲信中写道：“我凭着艺术的力量和极度的谨慎才使自己多少站住了脚，但是当我过早地感到自己已经体力不支的时候，才发现我失去的光阴太多了。长期以来我的身体恶劣得难以形容和描述。”为了使自己的病情好转一些，尼采又来到了熟悉的老地方西尔斯·玛丽亚。在这里，尼采忍着病痛，顽强地创作了一本书《偶像的黄昏》，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该书中，不到3个月时间，这本书就顺利完成了。后来尼采在自传中曾对这本书作了这样的介绍：这本不到150页的著作，像一个发出笑声的恶魔，令人愉快而又可怕的语气，可以说是一本非常特殊的书——这本书是在短短数日间写成的，以致我不愿说出所费的时间：没有一本书的内容比这书更丰富，更富于独立性，更富于破坏性的——更为怀有敌意的，如果有人想要约略知道，在我之前，一切事物是如何地本末倒置的话，那么， he 可以从阅读这本书来开始。本书内封面上所说的‘偶像’，

就是向来被称为真理的一切东西。偶像的黄昏，用一般的英语来说，就是指旧的真理正在接近尾声了。”

《偶像的黄昏》实际上是模仿了瓦格纳的音乐剧《神的黄昏》之名。所谓偶像，是指过去被称为真理的东西，现在尼采却想用拳头将其粉碎。尼采在给勃兰克斯的信上说：“这部作品是我的哲学缩小版，激进得几乎接近犯罪。”

《偶像的黄昏》与前几本著作一样，也是采用了格言形式，不过这本书的格言用得精粹生动，可以说是尼采格言文体的最高峰。

1888年9月，尼采又开始计划撰写《反基督》一书，他想此书作为他长篇大著《一切价值转换》的第一卷。在《反基督》一书中，尼采再也没有采用他已用得很熟练的箴言体形式和诗歌的形式，而是以一种议论文的格式来进行创作了，虽然文风与以前不同，但是在这本书中，尼采反基督的观念一点也没有变，相反，倒是变得更加尖锐了。在该书中，尼采批评说：“基督教被称为怜悯的宗教，怜悯和那些提高我们活力而使人奋发的情绪相反，它具有有一种压抑的效果。当我们感到可怜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就被剥夺了。这种被痛苦所加于生活之上的力量的丧失，又进一步被怜悯所增加和扩大了。怜悯使痛苦茫然。在某种情况下，它可以导致生命和活力的完全丧失。”

针对着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尼采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价值系统，他说：“什么是善？凡是增强我们人类力量感的东西、力量意志、力量本身，都是善。什么是恶？凡是来自柔弱的东西都是恶。”尼采认为基督教的道德是奴隶道德，人类应该

重建自主的道德。他主张以生命力的强弱作为新道德的准则，并打破现代精神的虚无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反基督》一书中，尼采虽然极端地反对基督教，但他并未反对耶稣本人，他只是批评了耶稣的门徒因耶稣之死而怀有了憎恨与复仇情绪。他主张把耶稣还原为一个常人，而不把他过份神圣化，他说：“实际上只有一个耶稣，而此人死在十字架上了。”总之，他是想通过这些解说，使人们自觉醒过来，而不要过份沉溺于对虚假神的信仰中。

写完《反基督》一书后，尼采似乎对自己的生命力表示了忧虑，在 1888 年 10 月 15 日，尼采过完 44 岁生日后，开始着手写自己的自传了，自传的名字是《瞧！这个人》。在这里，尼采借用了皮拉多指看吊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说的一句话，其意是把自己比喻为一个不被理解而又充满了伟大精神的人。《瞧！这个人》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自传，它不仅记录了尼采的生活经历，而且记叙了他各个时期的思想发展过程。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他写道：“鉴于在不久的将来，我必须向人类提出有史以来最庄严的挑战，阐明我是何人，就十分重要了。我所肩负的宏大使命与我的同代人的渺小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这是因为他们既未曾听过我的讲话，也未见过我本人。”

在写作自己的传记时，尼采认为他的生命已达到了顶峰，他说自己已经及时地突然重获了力量与自信来完成前人未曾尝试过的工作，为了使人们对这部书不产生误解，尼采在给勃兰兑斯的信中还专门介绍说：“这本书的题目是《瞧！这个人》，它无保留地抨击了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并在声讨基

督教以及所有染上了它的毒菌的基督教徒们的电闪雷鸣之中结束。事实上，我是基督教徒的第一位心理学家；同时，作为一名老炮兵，我还可以操纵重武器，实施这次攻击。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基督教对手们过去从未想到的。然而，所有这些工作都只是《一切价值的重估》一书的前奏曲。”

《瞧！这个人》是在 1889 年 11 月完成的。之后，尼采开始整理《尼采对瓦格纳》一书，这本文集选收了尼采自己以前所写的有关瓦格纳的各种文章，尼采认为，通过编写这本文集，他已彻底解决了有关瓦格纳的所有问题。

当尼采完成了《尼采对瓦格纳》之后，他似乎已把自己的全部战斗力量耗尽了。就在第二年的开端，尼采在意大利的都灵发了神经病，从此他的正常精神活动中断了。

第十四章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尼采的性格始终是忧郁的，他对生命始终比任何人都敏感，他的父亲在 33 岁时就死去了，这位短命的父亲在生前就是一个文弱、可亲、多病的人。父亲的过早去世，在尼采的心中留下了非常沉重而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像一根无形的绳索始终束缚着尼采，他在其自传的开头一章曾说：“在我父亲生命衰老的同一年，我的生命也开始衰老，在我 36 岁的那一年，我的生命力到了最低点——我仍然活着，可是我看不到我面前三步远以外的地方。那个时候，即 1879 年，我辞去巴塞尔大学的教职。整个夏天，像幽灵一样地住在圣慕尼兹（stmoritz）。而冬天，也是我生命中最低暗的一段时期，也是像幽灵一样地住在伦堡（Nuamburg）。 ”

可以认为在尼采的心中，他一直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充满了顾虑，他怀疑自己不会活得很久，他的这种感觉使他本来就虚弱的体质变得更加脆弱了。他在 12 岁的时候就经常头痛，后来，这种头痛病一直伴随着他，有时候他一连 72 小时头痛，这使他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而一件叫人不解的事是，每当他在极度的头痛中时，他在理智上却极端清醒，然后在冷静的状态下，他能想出许多充满灵感的东西。如果他处于健康的状态时，他反而不够细密，不够冷静。似乎他的灵感和深刻思想是以自己的头痛来换取的。尼采在这一点上确实

与常人不一样。

有一位医生曾经怀疑尼采在神经方面有毛病，但是经过几次检查，他又找不出毛病来，相反，这位医生怀疑自己的神经有了毛病。从器官上检查，尼采确实没有什么毛病，尽管他的眼睛近视而且接近失明，但眼睛的机能本身并没有缺陷，尼采对自己身体的矛盾状况始终百思不解，他只能对自己安慰道：“一个在本质上属于病态的人根本不可能变为健康的，靠一个人自己的努力去变成健康，那更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对一个内在健全的人而言，疾病甚至可以作为生命的有力刺激品，作为生命旺盛的刺激品。我就是以这种态度来看我长时期的疾病的，我好像重新发现了生命。我在某种方式之下，尝过一切美好甚至惊奇的东西，可是别人在同样的方式之下，却无法得到它们——从我的健康和生命意志中，我创造了我的哲学……由于，我希望这一点能为人了解，所以就在我生命力最低落的那年中，我不再是悲观主义者了，自我恢复的本能不容许一种贫乏和绝望的哲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尼采的身心愉快是靠他的意志来维持的，当他的意志开始崩溃时，他的身体和整个思想就跟着坍塌了。1889年1月3日这个不幸的日子，终于落在了尼采的身上。这一天的早晨，尼采正在街上漫步，这时他看见一个马车夫正在残暴地抽打他的牲口，这个精神脆弱的哲学家就开始又哭又喊起来，他扑上前去，抱住马的脖子，结果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房东费诺发现他后，把他送回房间，尼采在沙发上昏睡了两天两夜，醒来时，尼采开始出现神经错乱的症状，他不再是原来的他了。

这个时候，他给朋友不断地写信，信中出现了梦呓般的语言，如他在给朋友盖斯特的信上说：“给我唱一首新歌，世界变形了，天上充满着欢乐。”他在给朋友克哈特的信中又说：“实际上我宁愿当巴塞尔的一名教授，也不愿成为上帝。”

发疯后的尼采，经常在街上徘徊，他会突然拥抱和亲吻街上的任何一个行人，并且对着路人大喊：“我是神，打扮成这样！”

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尼采不断地给朋友写信，信的内容大都语无伦次，毫无逻辑，使朋友们摸不着头脑。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常常署名为“戴奥尼索士”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上帝”或“反基督”，可以说，戴奥尼索士和基督，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他的思想，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亚里阿多纳，我爱你，戴奥尼索士”谜一般的话，而接到此信的是瓦格纳夫人，回想起来，尼采虽然否定瓦格纳，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年轻时在特里普森与瓦格纳夫妇度过的那些快乐时光。在他信中的其他一些疯言癫语却也证明了尼采至死都仇恨德国霸权主义和反犹主义，他在一封信中说：“我本人刚刚就建立反德联盟一事拟定了致欧洲各宫廷的备忘录，我想用一件铁衣裹起这个‘帝国’，煽动它打一场绝望的战争。在我尚未把那年轻的皇帝连同他的喽罗擒拿到手之时，我没有空。”在另一封信中，他重复地写道：“取缔一切反犹分子，打倒反犹分子。”

尼采的好朋友欧佛贝克也收到了尼采的这些怪异的信件，他特地从巴塞尔赶到都灵来看尼采，他走进尼采的房屋时，尼采正在修订《尼采与瓦格纳之事》，当他看到这位朋友

时，立刻扑在他的怀里恸哭起来，泪水沾湿了欧佛贝克的衣服。尼采的这种情形，使欧佛贝克非常惋惜和同情，当天，欧佛贝克给妻子去信谈到了尼采的病情，他说：“尼采在很多地方像个孩子，对其他人来说，尼采是没有任何伤害性的，他的状况很遭，但他绝不会伤人的。”为了治好尼采的病，欧佛贝克亲自把尼采从都灵护送到巴塞尔，并送往一位有名气的大夫的诊所里进行住院观察病情，尼采在这里刚住下，他的母亲也从故乡瑙姆堡赶到了巴塞尔来看护他。在巴塞尔住了几天院后，尼采又被母亲护送到德国耶拿，在耶拿大学宾斯文格大夫的精神病诊所里，尼采的病情有所好转，他的母亲在给欧佛贝克的信中高兴地说：“他看上去和过去的身体健康状况差不多。”有一天，尼采看到妹妹在他身边擦眼泪，就惊讶地问：“好妹妹伊莉莎白，为什么哭，我们不是很幸福吗？”

在尼采住院治疗的这段时间里，他过去的好友盖斯特专门来到他所在的精神病院，每天与他一同散步，陪伴尼采度过了2个月的时光。

1893年，尼采的妹妹伊莉莎白也从南美洲的巴拉圭返回到德国家乡瑙姆堡，她看到市场上对尼采的著作的需求量不断增大，于是决定出版尼采的文选，她坚决反对盖斯特正在进行的写作尼采传的计划，而坚持由她来为尼采写传记。同时，她还按照自己的意志，篡改哥哥的手稿。而此时的尼采却对自己的状况知道得越来越少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已经如同潮水一般在疯长，他整天都一声不吭，孤独地坐着。

1895年秋天，与尼采保持友谊时间最久的欧佛贝克来看

望他，这是他最后一次探望尼采。看望尼采后，他在给尼采早年时的另一个朋友洛德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在他的房间里看见了他，他就像一只受了致命伤的野兽那样躺着，只想一个人呆在那里，我在那儿的时候他一声未吭，除了无神的眼睛中流露出深深不安外，他看上去好像没有在遭受病痛的折磨。”就在欧佛贝克看望尼采的第二年，尼采的母亲，贤淑的弗兰西斯卡夫人，不幸与世长辞了，这对病中的尼采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经过妹妹伊莉莎白的安排，尼采被移居到了魏玛。到魏玛以后，尼采的身体迅速恶化。这时候，连谈话都感到非常吃力了。1900年8月20日，星期一，尼采开始患感冒，发高烧，说胡话，此时他已开始接近死亡的边缘地带了，他的妹妹这样描述了尼采当时的情景：“1900年8月20日，哥哥突然患感冒，发高热，呼吸困难，似乎还有肺炎的并发症，忠诚的医生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消除他的痛苦，但两三天后，医生已经知道无力挽回了。24日正午，我和哥哥相对而坐，他的面容突然改变，激烈地发作再度袭来，哥哥终于失去意识倒下了。就在这时，可怕的雷雨漫天盖地而来，似乎这个高贵的灵魂，已随着雷电，先升登天堂。到黄昏时分，他吐出一口气，意识也有恢复的征兆，好像想说些什么。次日凌晨2时，我请他饮一些食物，他似乎看得见我，示意我把灯罩移到一边，高兴地叫我“伊莉莎白”，我满心欢喜，以为他的危险期已经过去，然后，他睡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一直在祈祷，但愿这是复元的熟睡。”

但是他那亮贵的面容突起变化，转为深浓，他再一次睁开那双宽阔、湿润的眼睛，安详地、无忧无虑地向四周投下

了严肃的一瞥，然后轻轻合拢，永远地闭上了。

尼采终于走完了他 56 岁的生命历程，永远地离开了喧嚣的世俗生活。在他出殡时，有人在挽联上写着：“你的名字在后人心中是神圣的。”但是尼采似乎并不满意这样的评语，因为在他生前的自传中，他曾这样写着：“我很怕将来有一天有人称我为神圣的，你可猜得到为何我要在死前拿出这本书，就是为了要防止别人对我的恶作剧，我不希望成为神圣的人，甚至于宁可死后做个怪物——也许我就是个怪物。”

死后的尼采埋在了故乡洛肯镇父母亲的墓旁，在那个安静的地方他找到了自己的永久归宿，再也用不着担心人们去打搅了。在真正的宁静中他获得了永生。